

TONG

同济规划

TONGJI PLANNING NEWSLETTER

求精·做实·解难·创新 简讯

总第二十四期
03/2015

REAN

LANNING



同济规划 TJUPDI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同济规划

简讯 总二十四期
2015/03



简介

INTRODUCTION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立于1994年（前身是1982年成立的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与建筑研究所），是全国首批取得“城市规划设计甲级资质”及“旅游规划甲级资质”的规划设计科研机构。

企业精神

求精·务实·解难·创新

技术优势

我们始终致力于城市发展战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城市设计、区域城乡体系、城市更新、社区与乡村发展、城市交通体系、城乡基础设施与防灾减灾、旅游度假以及世界遗产等领域的研究和规划。累计完成各类规划项目肆仟余项，项目覆盖全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欧、亚、非等地区，在行业内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

机制保障

依托同济大学城乡规划学科在国际与国内突出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坚持城市规划实践与科研、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思路，发挥“产、学、研”一体化的综合优势，形成了“教授研究团队与规划设计团队合作”、“综合规划设计所与专业领域研究中心协同”的项目运行机制。同时也与地方共同开展人才培养、跟踪服务、教学实践的三位一体基地建设合作机制。

人才实力

全院现有员工530余人，拥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90余名，“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130余名。同时拥有同济大学十余名知名教授组成的总师专家组，参与并指导重大项目、创优项目、创新项目的规划设计；并在基础研究、学术交流方面领衔创新。

社会责任

持续参与了“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场馆规划”、“四川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4.20雅安地震灾后宝兴县灾后重建规划”、“7.22定西地震灾后重建规划”、“新疆巴楚对口援建规划”、“云南云龙县定点扶贫规划”、“日喀则地区援藏城镇规划”等国家和地区重大项目及社会援助项目，以规划和技术回报社会。同时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贵州民族村寨中进行道路设施修建、地方农产品推广、村寨生态文化博物馆设计、传统民居修缮指导、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培训，以及在汶川地震灾区帮助残疾人开展再就业技能培训等社会帮扶工作。



目录

CONTENTS

新闻 NEWS	04
第四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活动报道	06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S	08
2015年“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	08
作为文化孵化器的商业街：国际城市中的身份认同、多样性和遗产 / 莎朗·佐金	08
中国城市的未来——源自社会主义的艰难道路 / 约翰·R·罗根	09
城市社会发展及城市规划的作用 / 张庭伟	11
移民和社区发展：如何建设更加包容性的城市社会 / 任远	12
前沿观点 VIEW POINT	14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 / 郑德高	14
同济规划讲堂 TONGJI LECTURE	20
上海与长三角区域城市群协同发展 / 彭震伟	20
精英讲坛集锦 / 匡晓明 周珂 张恺 裴新生	23
创新项目 INNOVATION PROJECTS	25
蚌埠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年）	25
吉林省长白县城乡发展规划	28

新闻 NEWS

贺董鉴泓教授九十华诞

2015年5月28日,董鉴泓教授九十华诞暨《董鉴泓文集》首发式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钟庭报告厅隆重举行,董老先生的同窗、同事、学生等二百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同济生活70年,虚度年华90载。”这是董老先生对自己过往平和又幽默的评价。董老先生于78岁高龄时创办“第一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并设“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如今已是规划学术界公认的最高水平论文奖项;84岁时,出版了《中国古代城市20讲》;2014年,《董鉴泓文集》又被选入“中国建筑名家文库”出版;并于今年获得了上海市教委系统“老干部先进个人”称号。

《董鉴泓文集》收集了董先生的近60篇代表作,分为城市规划工作、城市规划实践与理论、近代城市、古代城市、规划教育等章节,涉猎广泛。



宝兴县灾后重建

2015年4月18日,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周俭与都江堰分院院长肖达同赴四川省宝兴县灵关镇,对“4.20”芦山强烈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编制与实施工作进行检查与指导,并就灵关镇灾后重建工作的下一步安排和实施,与宝兴县人民政府县长余云峰、宝兴县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张晶(兼灵关重建指挥部指挥长)充分交换了意见。

灵关镇是未来宝兴县“一城二组团”的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新区是继都江堰壹街区之后又一个由同济大学负责整体规划设计和施工的灾后重建项目。

2015年4月19日,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复兴研究中心主任周珂与中共宝兴县委书记韩冰,就我院负责编制的“宝兴县县城灾后恢复重建规划(2013-2020)——灵关组团城乡一体化发展实施规划”向中共四川省委王东明、四川省人民政府省长魏宏、常务副省长钟勉、副省长王宁等进行了汇报。

中共雅安市委书记叶壮,雅安市人民政府市长兰开驰等地方领导出席了汇报会议。

重建规划以2014新型城镇化国家战略为要求,统领宝兴县城穆坪-灵关“一城二组团”的一体化发展。规划以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落地为目的,确保灵关组团至2016年全面完成三年灾后恢复重建任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产生活质量快速恢复和跨越提升,提前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中国汉白玉产业基地和宝兴县经济与商贸中心。

王东明书记和魏宏省长在听取汇报后,对一体化发展实施规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我院能够在宝兴县的灾后重建工作中再接再厉,取得更大成绩。



(供稿:都江堰分院 复兴研究中心)

西藏日喀则援建

2014年6月26日,国务院批复撤销日喀则地区,设立地级日喀则市,并于同年12月18日,举行了撤地设市挂牌仪式。原县级日喀则市改为桑珠孜区。

在此背景下,上海与日喀则开启城市总体规划合作,由上海市规划局牵头,组织上海规划设计团队,开展日喀则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并以来沪短期培训、安排上海专家赴当地指导讲学等形式,扶持日喀则市规划专业技术人员培养工作。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作为此次规划合作的技术援助力量,负责编制《日喀则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

此次日喀则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由周俭院长带队,总师专家组孙施教教授为技术总负责,周玉斌副院长担任项目负责人,带领规划三所、规划四所、建筑与城市空间规划设计所、城市交通与地下空间规划设计所、严国泰教授工作室共同完成。

2014年11月,规划团队首次入藏,就规划编制工作与日喀则市领导进行了初步的交流。2015年4月7日,我院规划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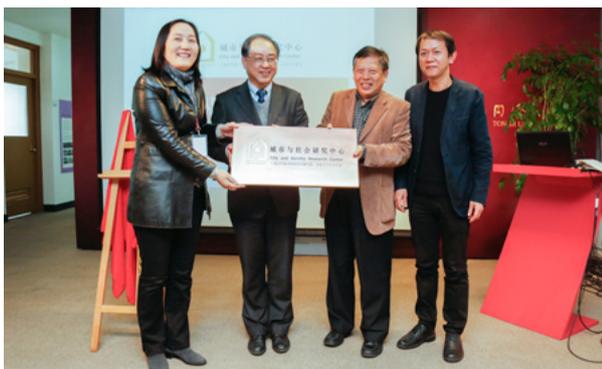
队一行 23 人赴日喀则，分东、西、北、东南、西南五条线路进行现场勘探与调研，并于 4 月 16 日就调研情况及规划整体思路进行了汇报。

此次规划合作将以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为借鉴，以高水准的规划技术为援助，更好的发挥日喀则区位优势，融入到“一带一路”战略与其他省市的经济圈中，建设具有高原特色的产业体系和城镇空间格局，推进日喀则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也与西藏区内其他地市形成合力，推进西藏全区的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的跨越式进步。

城市与社会研究中心挂牌成立

2015 年 4 月 10 日，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联合组建的“城市与社会研究中心”在同济大学文远楼 3 楼报告厅举行了揭牌仪式。

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和副校长江波出席了此次仪式，并为中心揭牌。同时，由郑时龄教授等中外专家 20 人组成的“城市与社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正式成立，自此开启了同济大学城市与社会协同研究的新篇章。



(供稿：亚太遗产中心)

2015 年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青年规划师主题演讲比赛

青年规划师是一支新生的热血的规划师力量，亦是中国规划行业的未来。2015 年 4 月 24 日下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青年规划师演讲比赛如期开展。

此次演讲比赛共分四组，分别就区域统筹与乡村规划、城市设计与文化传承、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研究方法与技术创新四个主题展开，共 43 名青年规划师参与了演讲。比赛邀请了同济大学的十三位专家担任评委，对参赛规划师的演讲进行评审；专家就演讲话题切入的角度及内容、演讲 PPT 的图文搭配、演讲内容的结构形式、层次和深度、因果关系对接、连贯性及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点评。

比赛评选出了一等奖 5 篇、二等奖 11 篇、三等奖 11 篇和鼓励奖 5 篇，并在一、二等奖的演讲人中选出了 4 人参加了今年 5 月在同济大学举办的第四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图为青年规划师演讲现场照片

“PASSAGE——步行环境空间整合规划设计国际竞赛”

3 月 12 日至 3 月 19 日，“PASSAGE——步行环境空间整合规划设计国际竞赛”在上海举行，经过遴选出的来自法国、西班牙、荷兰、波兰等多国的八支年轻规划师、建筑师团队参与了此次竞赛。19 日下午，随着专家评审的结束和一、二等奖揭晓，大赛圆满落下帷幕。

此次大赛针对正在进行后世博开发的世博园 A 片区：东至白莲泾、南至雪野路、西至上南路、北依黄浦江，将建成世界知名企业总部办公区。

最终来自法国的设计团队以名为“间”的设计方案夺得一等奖。该方案考虑了时间、空间维度和宏观、微观维度，提出了比较有效的机动性改善策略，可实施性强。获二等奖的两设计方案分别名为“小幸福”和“更美好的城市生活”，前者着重于生活点滴，视角独特；后者考虑了场地的世博记忆，规划结构比较明确。

本次竞赛由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发起，同济大学、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上海世博集团联合举办，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八家单位协办。

获 2014 “沪疆杯”立功竞赛“优秀集体”奖

2015 年 6 月 3 日，2014 年度“沪疆杯”立功竞赛表彰暨 2015 年度动员大会在新疆喀什举行。上海市援疆规划联合团队（含同济城市规划设计院、上规院、复旦、新区院）、规划十所的巴楚塔格吾斯塘村村庄规划团队分别获“优秀集体”称号。

近期中标项目（2015 年 3-5 月）

1、信阳外国语高级中学项目规划方案

团队：规划设计三所；项目负责人：裴新生

2、秦文化广场概念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修建性详细规划

团队：丝绸之路规划设计所；项目负责人：周俭

3、淮安市里运河文化长廊总体方案设计

团队：城市开发规划分院；项目负责人：夏南凯

(供稿：投标办)



第四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活动报道

“新常态，新应对”——2015年5月16日，以此为主题的第四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在同济大学如期举办。

当前，正是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指导下，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以及新型城镇化规划，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同时，我国也面临经济增速回落平稳，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动力由传统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新常态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对新常态的适应力，取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且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新契机、新发展。

这一背景下，作为“政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重要公共性政策之一”的城乡规划，也面临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文化、技术等多方面外部条件的深刻变化，规划师作为城乡发展改革的思考者、探索者和创新者，将成为这个转型时期的见证者、实践者和主导者。

开幕式

此次论坛以“倡导规划实践的前沿探索、搭建规划创新的交流平台，彰显青年规划师的社会责任”为宗旨，聚集了来自规划学界、规划院校、规划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青年规划师五百余人，共同探讨、深入交流新常态下的各类规划创新实践的得失。

上午8时，论坛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教授的主持下，正式拉开大幕，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彭震伟在开幕式上致辞。伍江副校长在致辞中提到，在新常态下，规划界将面对更多新问题的思考和新的挑战，希望以此与青年规划师共勉。吴志强副校长说：“我特别期待青年规划师以新思路、新想法去解决新的问题，希望青年规划师本着规划界的精神提出新的创意，规划的成功取决于规划师的创意。”

开幕式致辞嘉宾



伍江 副校长 吴志强 副校长 彭震伟 书记 张尚武 副院长



与会领导与专家合影

主题论坛：新常态，新应对

在随后的主题论坛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凯副院长、同济大学唐子来教授、日本国立金泽大学沈振江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赵城琦研究员，分别围绕城乡规划的新环境，展开多层次、多视角下的规划问题探讨的主旨报告。



主题论坛现场内外照片



王凯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主题：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的新思维

王凯副院长分别从京津冀作为国家战略的背景解析、京津冀发展存在问题的程度和判断、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创新思考三个部分进行了深入解读、客观剖析和创新思考。并以该规划为例，基于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的思维逻辑，从前提篇、规划篇、实施篇三个层级，为参会者总结和分享了其严谨的规划编制思路。报告最后，王凯副院长结合其丰富的规划从业经验，为大家奉献了他的工作体会，即规划编制工作“要广泛听取意见，更要独立见解；要国际经验借鉴，更要符合国情；要埋头规划创作，更要主动沟通。”为青年规划师们在新常态下开展规划编制工作理清了思路和方法。



唐子来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主题：对城市设计和规划控制问题的再认识

唐子来教授介绍了中国城镇化“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规划的七个基本原则。在核心的七个维度中，“制度维度”是最重要的。并以“城市设计属性：管理 VS 设计”、“城市设计事权：政府 VS 市场”、“城市设计实务：效率 VS 效果”三个议题来叙述了城市设计的“新应对”。唐子来教授说：“城市规划作为一个公共管理，要明确为什么要管理，要明确城市设计的事权，要有独立思考。”最后，唐教授以上海世博会最佳实践区为例，对城市设计中的公权要素需要进行严格控制，而对私权要素不进行过多干预，从制度上建立城市设计有效的控制方式，在城市建设中对达到城市设计目标形成可采取的操作手段。



沈振江
日本国立金泽大学教授
主题：新方法、新技术在城市规划研究中的应用

沈振江教授以日本规划的工作流程为例，介绍了新技术手段在规划行业中的应用，并从五个应用层面展开描述。第一层面是规划及设计方案的展现：利用虚拟现实（VR）及云技术手段给用户展现规划成果；第二层面是将日本规划政策在民众中进行普及推广：基于BS架构下三维技术的应用开发智慧规划系统（JSPS），指导民众直观化地进行规划法规学习；第三层面对规划设计方案的提议整合收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在线收集民众对于规划设计方案的意见，使之更具有针对性；第四层面是对于规划设计方案的探讨与审议：通过内容管理系统（CMS）的应用搭建民众与规划编制人员之间的桥梁，充分发挥民众自主性，调动民众规划参与；第五层面是云端虚拟现实技术及大数据技术对于规划编制的支持：通过新技术手段的有效介入完善规划方案的模拟。总结来说，即是期望建立从政策制定到规划设计各个层面的整合化平台，为更好地实现规划服务民众努力。



赵城琦
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员
主题：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城市更新方法与与实践

赵城琦研究员在报告中提到，城市更新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其主体为政府、开发商以及建筑产权所有者。利益相关者的多方博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推进非常复杂，需要新的规划技术和完善的城市更新制度来保证这个过程的顺利进行。赵城琦研究员通过对上海、东京等城市的案例研究，提出上海旧区改建的拆迁成本易大于土地招牌挂的成本，导致旧城更新难以进行。在制度方面，建议改善型居民委员会，通过政府和民间以及相关利益主体共同改建实现街区更新；在技术方面，建议做容积率缓和，作为城市更新时政府调控的容积率储备，以达到多方主体的利益平衡。

创新论坛：城乡统筹与规划变革；城市设计与文化传承；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研究方法与技术看新

下午，围绕“新常态，新应对”这一主题，以“城乡统筹与规划变革”、“城市设计与文化传承”、“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研究方法与技术看新”四个议题组织的“创新论坛”，在规划学院钟庭报告厅、D楼D501、D502、D503以演讲、互动、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平行开展。与会专家与青年规划师围绕议题展开了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同时也促成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城乡规划师之间的交流。



城乡统筹与规划变革论坛现场照片



城市设计与文化传承论坛现场照片



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论坛现场照片



研究方法与技术看新论坛现场照片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作为常设论坛，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同济大学、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联合主办，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城市规划》编辑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参与协办。

2015年“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

2015年4月,以“社区·空间·治理”为主题的首届同济大学“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在同济大学举行。论坛旨在聚焦中外城市社区在发展演变、转型重构、制度机制等方面的经验与问题,并以此促进城市研究方面的跨学科对话及交叉学科合作,以期为城市空间、基层治理、社会问题的改善与解决,提出综合视角的学术支持。

作为国内首次在城乡规划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跨界交流,论坛的议题围绕我国当今新型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以主论坛、五个平行分论坛和圆桌讨论会的形式展开探讨,议题主要包括:全球城市与城市社区、社区治理与社区参与、社区资本与身份认同、社区规划与社会空间、社区遗产与集体记忆。

此次论坛受到了国内外两大学科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和积极响应,聚集了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城市规划、社会学界致力于城市与社会发展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80余人。与会期间专家们就议题展开了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发言和讨论,专家的观点和建议为城乡规划和社会学的研究合作开阔了新的视野。

以下为此次“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四位主旨发言专家的演讲整理稿。



图1, 全体参会人员集体照
图2, “交叉学科城市研究前沿讨论”圆桌讨论会
图3, “遗产社区与集体记忆”平行分论坛
图4, “社区规划与社会空间”平行分论坛



莎朗·佐金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和研究生院社会学系教授

作为文化孵化器的商业街：国际城市中的身份认同、多样性和遗产

过去四年中,我与全球的社会学同事一起探讨着一个重要的议题“地方商业街”,探讨这些看起来差不多的小空间在社会、文化及经济维度上的重要性。地方商业街、小商店、商人和购物者共同组成了文化认同的孵化器,是能与本土遗产互动的场所,并成为各国移民的汇聚之地。

本课题通过微观视角审视商业街中的全球性及地方性问题,并在全球不同城

市间进行比较研究。如果我们行走在商业街上,我们看到一样的情景,人们结伴或独自逛街购物,但如果我们再深入探究,就会发现不同城市的商业街是体现文化认同的独特景观。以阿姆斯特丹的商业街为例,建筑、红色橱窗、地面的电车轨道及行人使用的婴儿车无不体现了高识别度的

地方身份认同。(图1)

地方商业街的社会生态系统

作为研究者,阐释这些不同元素如何相互融合、形成一个生态系统是非常重要的。我借用法国城市学者列斐伏尔(Lefebvre)的理论来说明本土商业街

由 Sharon Zukin 教授领衔的 Global Cities and Local Streets 课题组自2011年起在纽约、上海、阿姆斯特丹、柏林、多伦多及东京六大城市进行了本地商业街的比较研究,其研究成果将于2015年7月由Routledge出版社出版。



图1, 阿姆斯特丹 Utrechtsestraat 街景

作为日常生活多元化的多维度空间以及文化遗产的孵化中心的作用，并将商业街生态系统划分为结构空间、生活空间和想象空间。

结构空间由三种内部因素：店主、购物者和建筑所有者；以及四种外在因素：供应链、居住区、媒体和地方政府组成。其中地方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许多法律法规直接决定了商业街是否得以生存和发展，如分区政策规定了空间用途，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移民政策是否鼓励外来移民定居和创业等。

生活空间是人们进行互动交往的社会性空间，它保留了珍贵的集体记忆。小尺度的地方商业街空间鼓励商家、顾客、居民之间的互动，并形成—个共同体。同时，历史建筑与老牌商店也会成为当地人的集体记忆。在更为多样化的群体中，地方商业街空间能够再生产传统的社会互动形式，即便是简单的功能性交往也能创造—种尊严感、群体间的礼貌和宽容。因此，地方商业街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除了可见的物质遗产，其所承载的独有的交往方式、集体记忆也是更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想象空间是人们对街道现在和过去的记忆。不同人对同一商街有不同的想象空间，而且即便商街的功能几近相同，人们对其的意象也总是不同于其他商街的。同时，媒体广告塑造的街道形象能为外来游客提供文化认同的想象空间。

地方商业街的社会功能

地方商业街创造了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承载着人们日常消费、就业以及社会交往活动，是产生社会关系的日常生活世界。

传统地方商业街不仅有可见的建筑及景观遗产，同时也是承载记忆、传统交往及生活方式的空间，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方商业街虽然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但也不是一尘不变的，它嵌入并预示着城市的变化。在快速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商业街也相应发生着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来自移民，他们在城市中定居创业，参与再生产商业街的空间形态、商业业态及社会生活。

地方商业街的研究问题与成果

地方商业街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商业街是怎样变化的？商街中的社会及文化社区是如何形成的？市场和政府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抑或是互有分工？城市的急剧变迁中怎样保留其认同、多样性和遗产？商业街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如何？下面以纽约与上海为例展示—些研究成果：

纽约 Orchard street，19 世纪中叶起该区域逐渐成为工人阶级居住区，也是移民聚居地。近年来，街区由贫民聚居区逐渐变为绅士化为高档商业区，全球化使街区社会结构的发生不同形式的变化，日常小店正被画廊、精品店与咖啡店所取代，原先的移民创业梦想也转向了时髦者主导的绅士化。但是这种文化植入也面临着在有着少数族裔文化传统的社区立足的道德合法性困境。

上海田子坊商街起步于 20 世纪末，原先是条马路菜场。街区更新从艺术家开辟创意工坊开始，然后慢慢地扩展到了居民区，基本上是一个社区自发的草根发展模式。发展至今已—成为闻名的创意产业街区及旅游目的地，但过度商业化、租金飞涨，导致艺术家撤离，soho 模式发展遭遇困境。如何在发展变化中保持田子坊的社区魅力和平民性格，是田子坊正面临的挑战。

从纽约和上海的案例中不难看出，既用了生态系统分析框架对全球城市中的商业街进行了深入剖析，同时也在探讨如何保护作为文化遗产的本土商街及其多样性。



约翰·R·罗根

布朗大学社会学教授

中国城市的未来——源自社会主义的艰难道路

中美城市化比较

若以—种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我们能从美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得到很多启发。美国在 19 世纪开始了其快速城市化过程，其遇到的问题与今日中国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非常相似。

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令人惊叹却并非史无前例，在做中美比较时，我想强调中国面对的—些常规并且可以解决的问题。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 1850 年到 1910 年甚至到 1930 年，城市人口从 10% 到 50%，在—个非常短的时间变成了一个城市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在图表下方用黄色标注的曲线显示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与上方的美国的曲线几乎平行，从 1950 年到 2010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完成了 10% 到 50% 的飞跃。（图 1）

中国的城乡差距

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城市与农村的不平等，以及如何整合大量的新移民群体。农村的发展极大落后于城市，差异显著。下表集中了 2009 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数据，总体上的—个趋势是：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国家有最高的城乡差距。在城市化率为 10% 的国家，城市消费水平是农村消费水平的 2 到 2.5 倍。但是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达到 60% 或 80% 时，差距会逐渐消失。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 50%，但是其城乡不平等程度却和城市化率为 20% 的国家近似。（图 2）

中国对城乡差距的处理远远落后于其城市化速度，且这一差距有不断增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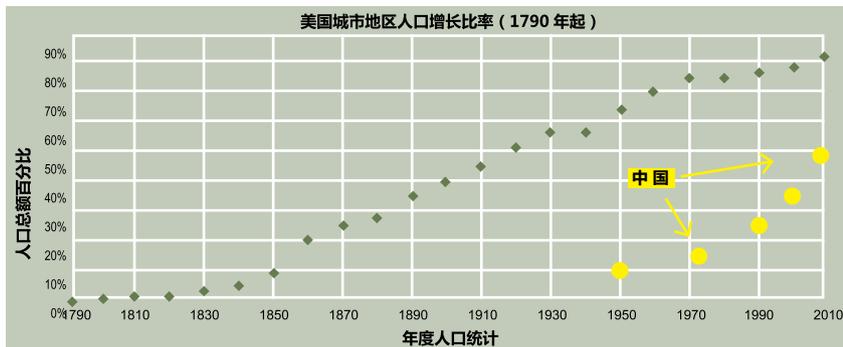


图 1，城市地区人口百分比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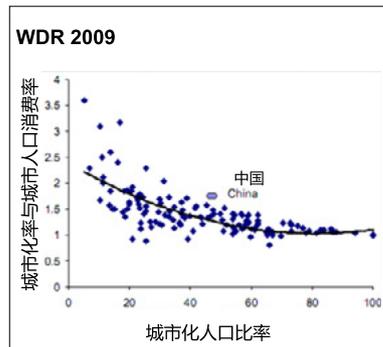


图 2，城市化水平与城乡差距

趋势。在 1995 年，城乡差距是 2.75，到 2003 年这一比值上升到了 3.1。尽管缺乏近年的数据，但很有可能这一差距在持续增加；且这一数值要高于同期的一些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韩国，这一指数在 1994 年为 1.03；在 1995 年的台湾，这一指数为 1.43。

从教育入手谈论城乡不平等是个不错的途径，可以将教育作为一项指标考察在城市空间里的城乡差距。以上海为例，拥有本地户口的 16 岁至 18 岁青年，将有非常高的可能性继续读书，女性（94%）的比例甚至高于男性（89%）；但对于没有城市户口的青年，这一比例少于 50%（男性 39%，女性 31%），低于农村地区的全国平均水平（男性 52%，女性 43%）。这是相当大的一个差距，它不同于收入和工作等差距是可以改变的，教育上的差距是永久性的。

美国未来的劳动力是拉丁美洲人，但同时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非常低，美国在为未来城市创造一支无技能、无竞争力的劳动力大军。上海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如果这就是我们对待未来劳动力的方式，我们的未来将面临怎样一个城市？

城市不平等的空间结构

接下来要谈到城市不平等的空间结构，在这一方面，中国与我研究的其他国家有根本的不同。我在中国的大部分研究与城市住房、住房改革、住房私有化有关。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中国的城市空间主要由单位提供的低价公共租房所构成，人们的住所与职业和收入无关，而与所在的单位息息相关。城市的空间结构仍能反映这一时期住房所有权的影响。以北京为例，在住房改革 20 年后的 2000 年，可以看到公共租房在核心区、近郊区与远郊区分布的情况。越远离城市中心，公共租房的比例越小，其他形式的住房比例越高。（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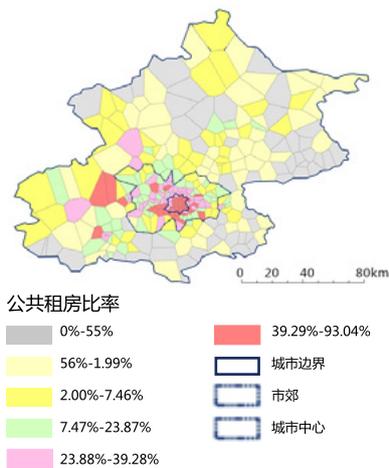


图 3：北京 2000 年住房分布

住房的分布与移民的空间分布紧密相关，下图显示了在每一个街道过去五年间（以 2000 年为参照）移民增长的比例，城市核心区的移民比例非常低，大部分的新增移民集中在郊区。人们居住的位置是一种根本性的隔离，在北京这也同时意味着社区资源，机会结构的隔离。移民的分布与公共住房的分布紧密相连。住房系统

实现了给有单位的本地人分配核心地区的公共住房，外地人居住在边缘的格局。而移民聚集的城市边缘，往往是一些由当地村民控制的社区，由于村民的垄断地位，他们以高价提供质量低劣的住房。城乡差距表现为城市核心区域与郊区的分离。（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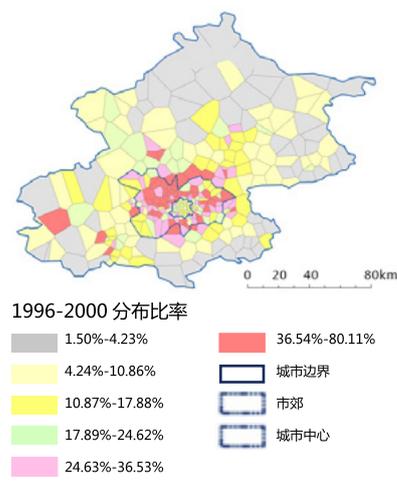


图 4：北京 2000 年近期移民分布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之间，公共租房创造了一个新阶级——有房产的新中间阶级。作为由政府政策创造出来的新中间阶级，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旦拥有了这一财富，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能持有它，后代也都能相继拥有它。

面对城市与农村的不平等应该怎么做？首先对于城乡差距，有一些政策可以实施，如帮助移民离开乡村，又如对农村进行投资，使得农民可以找到就地的工

机会。其次，对于在城市空间上的差距，需要帮助移民融入城市，赋予他们平等的公民权力；打破村民的垄断，为移民社区提供基础设施，尤其是为移民提供教育。

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谁将为这些服务买单？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为移民提供教育，而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讨要资金，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政治冲突。在何种条件下，这一局面会被挑战，由谁来挑战，这是未来城市研究者的责任，是从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师、历史学者到政治科学家的责任，也是同济大学研究中心的未来议题。



张庭伟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城市规划系终身教授

城市社会发展及城市规划的作用

当代城市社会面临的问题

社会问题的本质，是社会进化过程中变化着的动力因素和已建成的社会体制及传统的矛盾。历史证明：有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常态，社会矛盾无法消除但可以通过好的体制及政策减少、弱化矛盾。当代社会面对更加复杂的挑战：

1) 全球化带来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地缘经济越来越关联而地缘政治却越来越冲突，看似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的矛盾，实质是赤裸裸的利益冲突。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使地方政府管治当地经济、社会的能力下降。

2) 新科技特别是信息通讯技术 (ICT) 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新科技使传统社会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面临挑战，网络通讯和自媒体打破了政府和大企业的信息垄断，有利于政务公开也增加了管治的难度。

3) 贫富不平衡引发非正式活动 (Informality) 在各个领域蔓延。贫富

不平衡导致底层自发的非正式活动，在就业、居住、交通等领域蔓延。政府面临如何管治、或者适应这些非正式活动的问题。

4) 全球气候变化超出任何国家单一政府的能力。人类过度开发引起全球气候变化，带来各种灾害，控制气候超出任何单一国家的能力故需要全球合作，但出于各自利益，迄今难以达成国际协议。

这些问题缺乏社会理论的指引，同时社会上出现“政治疲劳” (political fatigue)，更多人转向关心实际利益，对价值观等“大道理”的关注度下降。一个表现是经济学家走红，社会学家冷落。

当代中国城市社会面临的问题

中国社会既面临一切国家发展过程中均面临的共同问题，又有根植于中国特点的特殊表现。当前中国主要的城市社会问题包括：

1) 网络时代政府公信力面临挑战，希望寻找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管治的新方式必须从理念转型开始，减少由上而下的管治，下放大部分管理工作，鼓励自下而上的半自治管理，让社区成为社会管理 (包括城管) 的细胞，并给予资金、人才、法律支持。根本而言，提升公信力在于提升全体公民包括公务员的素质，提升公众的理性参与水平。

2) 城市的中产阶级化，希望借鉴发达国家管理中产社会的政策。到 2022 年，中国城市将全面进入中产阶级社会。高、中高收入的中产阶级 (可支配收入 10.6 万元以上) 将增加为 2012 年的 4.5 倍，成为城市居民主体。这个人类史上最

大的中产阶级未来的消费需求、政治诉求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内在动力，也是未来城市规划服务的主体对象 (但不是全体)。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正能量，如何整合他们和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特别是与低收入阶层的关系，是关键的问题。

3) 主要城市进入老龄化社会，希望寻求老龄问题的对策。中国 60 岁以上老人占比：2011 年 13.3%；2015 年 16%；2020 年 17.2%；2051 年将达到 4.6 亿。老龄化是又一个普世问题，举世尚无成功的佳例。规划要从设计养老院，转向创新养老制度，包括中国条件下居家养老、社区及政府养老院的资金、管理、社会分工问题，而不仅是养老设施的规划布局及设计标准。

关于城市社会发展的理论：政体理论

联合国人居中心主任 Clos 提出的“新城市日程”，包括管理法规、社区管治、城市设计三方面。(J. Clos, 2014《Towards A New Urban Agenda》) 它们都和城市规划有关。对于城市问题，可以借鉴政体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

出现于 1970 年代的“政体理论”认为城市社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企业、社区三方面。(表 1)

中国发展模式开始从“促进发展”转变为“管理增长”，反映了城市管治联盟的转变，社区地位上升。(图 1)

讨论：中国的城市社会发展规划

社会问题在历史上有常态性，在空

表 1, 城市管治的四种联盟及其政策

政体联盟	成员	政策取向
促进增长 (pro-growth)	政府 + 企业	主要考虑效率，强调最大产出，经济增长导向 (推动房地产，制造业等发展)
管理增长 (growth management)	政府 + 企业，社会积极参与	考虑效率和公平的平衡，鼓励增长，但力求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分配的平衡
维持现状 (caretaker)	政府 + 社区，企业参与	强调最小社会代价，不鼓励增长
帮助弱势 (progressive)	社区 + 政府	强调社会平等，倾向弱势阶层，补助低收入群体

根据 Logan & Molotch, 1987; Stone 1989

间上有普世性，人类长期产生的理想社会也因此具有普世性。但是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没有普世性，必须按照国情、甚至按照不同地区的特点来制定。因此解决社会问题要从国家层面的城市政策提出框架，然后通过放权到地方层面来落实。

政府的社会政策有两种基本途径：政府直接、或间接参与社会事务。其实质是政府、社会、企业三者为解决社会问题时如何进行责任分工。

城市规划作为地方政府的公共职能，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规划并非社会发展的龙头，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角，但规划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可以落实在四方面：社区规划，战略规划，项目选择，及规划理论。

1) 社区规划：社区规划不仅是物质性设计，更包含了政策分析和政策评估。如当代美国的社区规划，在经济方面的中心是就业（创业，就业/再就业培训）；在社会方面是公共教育、医疗和社会安全；在环保方面是保护绿地、城市农业、食品规划。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广泛的社区规划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planning) 而不是社区设计，是努力的方向。

2) 战略规划：中国规划界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影响体现在战略规划上。过去30年，战略规划对各级城市的经济及空间发展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贡献，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是规划缺乏社会性考量。

2010年代后，中国提出城镇化、“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规划应该主动发挥本职职能，善于未雨绸缪，敢于讲授真理，减少不确定性、增加应对变化的弹性，吸取经验，减少失误。增加规划的社会性考量，如对增长的代价、发展的弹性 (resilience) 的考虑等。

3) 项目选择：规划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表现在项目选择上。规划工作的中心是公共产品而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性的工作如抗震救灾规划是规划对社会的

重要贡献。增加对弱势社区的关注而不仅仅是规划中心区或新城，项目选择本身就反映了规划价值观从局限于经济发展向经济社会综合发展、从锦上添花向雪中送炭的转向。

4) 规划理论：规划要对社会发展有贡献，规划理论必不可少。城市研究 (Urban studies) 中社会学、经济学是两大主体。中国的城市研究受经济学影响很大，但社会学的研究有待加强。发达国家的社会学理论丰富而复杂，极端的观点往往抓住人的眼球却抓不住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介绍国外理论时，应该介绍背景，认识到保守的理论和过于激进的理论同样于事无补。

总之，2015年以后的中国规划进入了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做好准备，迎接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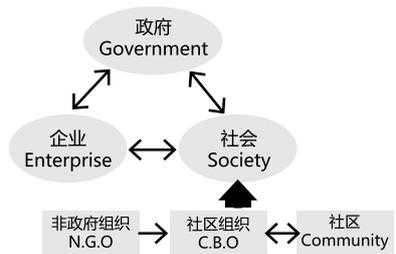


图1：政体理论及其扩展



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移民和社区发展：如何建设更加包容性的城市社会

新产业和经济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移民，移民不断融入所在的城市社区和城市，生活社区构成了移民融入城市社会的一个生活平台和空间的载体，移民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生活社区，改变和建设所在的城市，促进城市的更新和成长。

不同类型的移民 - 社区生活

目前上海2435万的人口中有1000多万的移民，就移民在所在乡镇街道的比重和在全市移民的比重的比值来看，他们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的新城地区和一些新工业地带。1000多万的移民根据其自身的经济收入情况、就业安排和教育水平，分布在不同的城市社区之中。27.4%的移民居住在新商品房社区甚至是别墅型社区；12%的人居住在老城市社区；居住在农村集体产权社区或城中村社区的占21.7%；37.4%的人居住在农村社区；还有部分移民居住在企业所提供的公共宿舍和集体宿舍中。（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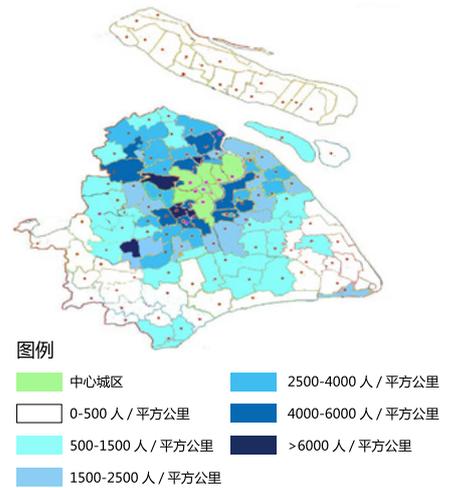


图1：外来移民在上海居住的状况

不同类型的社区居民，其生活模式和社会交往也因基础设施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在新商品房社区的移民，其教育水平、白领比例、进入各种社会保障体系、自有房的比重也更高。新商品社区的邻居中本地人口的比重较大，而在农村社区与城中村社区，其周围仍然是外来移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中村和集体宿舍存在的一种社会隔离性。

随着移民进入城市的年份增长，其生活的社区也会改变。例如在迁入城市1至5年的移民中，有28.5%居住在城中村社区；而在城市生活16年以上的移民中，居住在城中村的比例只有13.3%；居住在别墅区和商品房的移民的比重会随

表 1：移民进入城市不同时间的居住社区类

迁入年数	农村	城中村	老城区	集体宿舍	别墅区或商品房社区
1-5	34.8%	28.5%	9.4%	6.5%	20.8%
6-10	35.0%	22.9%	11.5%	1.7%	28.9%
11-15	32.4%	20.5%	10.5%	1.5%	35.1%
16及以上	26.1%	13.3%	10.4%	0.4%	49.8%

着进入城市的时间的增长而增加。(表 1)

影响移民社区融合的因素

城市融合是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共建社会生活的一个过程。我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了利用身份认同、对未来的预期、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相互交往、外来移民所感受到的社会态度这四个方面来衡量大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并据此提出了影响移民社会融合的三维框架,即“制度因素-个人发展能力-社区建设和社会资本”。

首先,制度因素中的户籍因素在中国对于移民的社会融合具有相当显著的影响。户籍制度及寄托在其之上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各种福利,是形成各种社会排斥的一个制度根源。制度因素关系到流动人口的民事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任何一项权利的缺失都限制了移民群体市民化的完成。

其次,移民个人能力的成长,有利于移民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因此,针对移民的教育及能力培养的计划,对于其社会融合非常重要。

第三,移民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对于其社会融合影响重大。社会资本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其流出地的亲属关系和老乡群体,另一种是在当地社会形成的本地化社会资本。后者对于移民的社会融合重要性可能更为重要,而过强的首属群体社会资本有时反而会限制移民的社会融合。

在思考流动人口融入所在生活社区的时候,有时我们还需跳出其所在社区的空间来理解社区发展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系。桑德斯提出“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的概念,认为流动人口往往在落脚的城市社区进入城市,并随着他们和所在

城市的关系加深日益离开落脚城市和融入城市有机体系。这样的落脚城市似乎看起来是一种空间上的隔离和排斥,但是实质上构成了移民进入城市和逐步融入城市的机制。在移民日益地融入城市和促进城市发展过程中,作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中转平台的落脚城市有可能显得越来越贫困和贫民窟化,但是其帮助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功能却是难以替代的。

移民主动参与和改造生活社区

城市移民一面是逐步融入所在的城市社区;另一面,也是主动参与和创造社区中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经济活动,并给所在社区带来功能变化和结构转型。社区功能、空间形态、组织模式及治理结构都随之发生改变。在城中村社区可以看到外来移民通过租赁房屋寻找发展机会,开设各种各样的商店,给社区带来改变和发展。纯粹的农村社区,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一个颇具城市化雏形的地区。

我们现在所讲的创新城市,往往重视技术创新;国家提倡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事实上移民社区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精神和创新基础的所在,是创新型城市的萌芽。移民社区往往有较低的土地和商务成本,能够支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创新空间。移民进入社区之后所形成的人口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恰恰是创新性城市最为重要的资源基础;而移民对社区的改造和对城市更新的能力,本身就是城市创新的重要力量,是改变社区生活面貌,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

如何建设更加包容性的城市社会

从移民和社区的关系来看,就要求采取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城市社区发展策略,

构造出积极的移民和社区关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包容移民的基础设施和社区形态的更新;二、包容移民的制度改革和体制建设;三、包容移民的社会建设、社会结构构造及社会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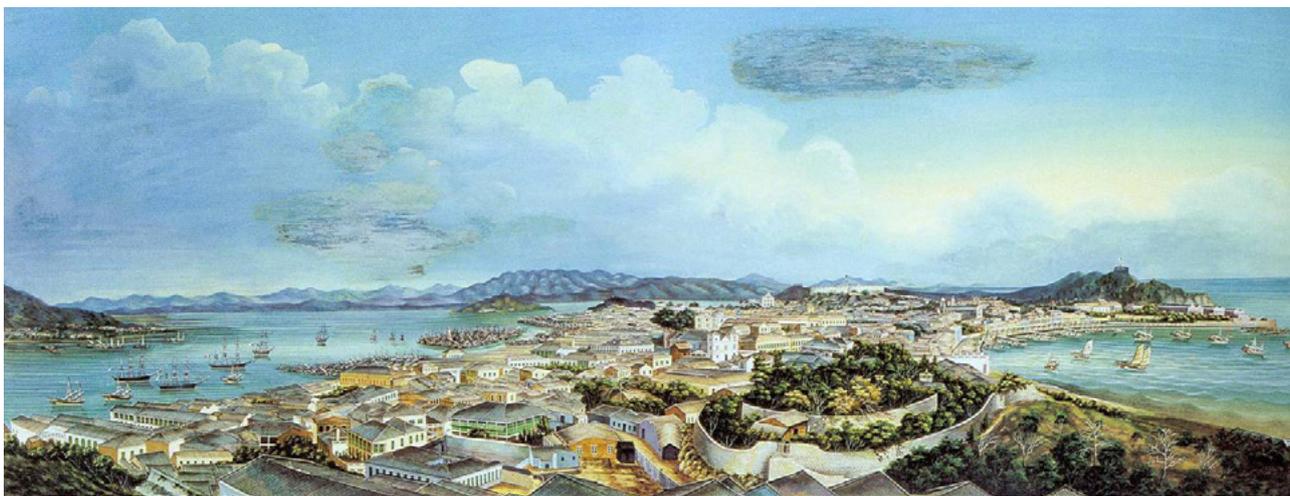
首先是社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升。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物质性的设施,也包括适应移民需求的环卫、教育、卫生等社会性基础设施。同时发展移民社区的多样性,在社区规划和社区发展中鼓励混合型社区的建设,努力破解社区隔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共享,来创造相互沟通和相互支持的环境。

其次,建设一个包容流动人口的制度改革和体制建设。在此过程中,重要的在于底端社会的制度建设。大量移民进入城市往往是通过非正规就业的形式,以及非正式的居住,而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就业和居住恰恰是已有的制度体系中所不能够接纳的。需要建立一种制度化途径,使得能够包容这类进入城市的方式。

最后,对于移民社区的管理,需要各部门的管理合力,通过法制化、规范化,使得城市人口的管理在法制轨道上运行。同时需要包容流动人口的社会建设,在社区层面上打造一个社区共同体,支持移民在教育、健康、子女幼托、婚姻、就业和创业等方面的具体需求。

任何城市都面临移民和城市人口增长挑战,在上海这个问题尤其突出。构建良好的城市与移民关系是现代城市应对大量移民集聚,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实现更加包容的移民与社区整合的公共政策,建设包容性的城市社会,才能实现移民的城市融合,实现移民与本地人口的良好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构的重建,并得以将移民转化成创新力量,引导和推动城市社区的更新和发展,走向不断新生的和不断繁荣的城市未来。

(文字整理:李家兴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博士研究生)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



郑德高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国际城市规划》编委，《城市规划学刊》编委；
第四届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委员；
上海市“十三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长培训中心客座教授；
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

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是一个要使中国走出去的战略，但一带一路研究非常难，因为研究的边界、范围、内容有很多不确定性，如何落到实处，不确定。

“一带一路”是总书记提出来的，长江经济带是总理提出来的，两个有很强的相关性，加上京津冀，形成了中国最重要的三大战略。反思上一轮国家战略，如国家新区，实际过于分散，这次的战略比较系统性，可以整合在一起。

一、关于一带一路

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大学里提到“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即“一带”，叫“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东盟会议上又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即“一路”，叫“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涉及的空间范围很大，约25国、全球一半的人口、四分之一经济量。主要是针对国际层面提出，是应对国际形势新变化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涉及很多国家，亚洲20个，非洲3个，欧洲2个，还有西亚、南亚和东南亚，这些地区政治经济局势比较复杂，但这个地区经济总量、人口的规模都比较大。空间则串联了两大国际经济圈，六大经济板块。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最长、最具有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串联东盟、南亚、中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

回顾下传统的丝绸之路，过去的陆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过波斯、伊朗、君士坦丁堡，一直到意大利。陆上丝绸之路很早就有了，经历汉、唐、宋、元以后

开始衰落。陆上丝绸之路通道很多，后来演绎出6个通道。随着国际关系变化，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封锁后，开始出现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说有东洋航线，西洋航线，南洋航线，涉及的国家地区多。海上丝绸之路最初在中国有3个主要出发点，包括泉州、明州（宁波）和广州，明末之后开始禁海，开始衰落。其它国家进入了地理大发现时期，哥伦布到第一次到好望角，麦哲伦从大西洋一直穿过来太平洋再穿过印度洋，其他国家开始主导海上丝绸之路。

这一变迁过程给我们启示：（1）古代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开拓了中国商品的世界市场。中国要实施走出去战略，不光是交易，还包括货币和税收。（2）要形成以中国为核心，合作共赢的国际贸

易体系。(3) 陆路通道的安全通畅取决于国力强盛与多通道格局, 一路一带是在国家发展到一定实力后, 如何实现走出去的新战略。(4) 一路一带既带动港口城市发展, 也对内陆城市影响也很显著, 尤其是一些货源点城市, 如景德镇。在新战略中港口发挥作用, 内陆节点城市也会发挥作用。也就是说, 一带一路可以推动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和内陆手工业城市的兴起。(5) 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

同时我们也对未来全球贸易格局的做一个基本判断:

判断一: 环印度洋地区成为全球三大主要经济和贸易板块, 根据普华永道、高盛等机构 2050 世界前 10 大经济体预测, 中国、美国、印度将成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 环印度洋区域与环太平洋地区成为同等重要的地区。美国在推进排除中国在外贸易战略, 所以中国需要形成以自己为主导的贸易战略, 而主导对象也较为明确, 包括欧盟、南亚、包括非洲的一动分, 形成一个新格局。

判断二: 走出去不是简单从产业转移承接地变成输出地, 更多是高技术产品、资本、服务贸易和文化。华为、中兴已经实行这样的战略, 有技术、资本和内涵的输出。对于上海而言, 有什么可以输出? 资本可能是一方面。中国目前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都超过一千万美元, 对外投资对象主要亚洲国家, 贸易重心转变, 上海、广州、孟买就面临新机会, 会带来全球体系的重构。但根据全球城市指标, 上海在全球影响力指标较弱, 仅仅依托港口地位不足以支撑上海全球城市定位。过去的世界城市和港口联系度很强, 但未来的世界城市和港口相关性会越来越弱, 更多在于实现资本、创新、服务、枢纽整合, 才能形成航运中心。

判断三: 贸易体系变化继续推动全球城市体系的重构。第一阶段是环大西洋

时代, 早期工业革命时期, 欧洲和美国西海岸港口城市是全球城市的主体。第二阶段是环太平洋时代, 全球城市向太平洋沿岸港口城市转移, 四小龙和美国西部崛起。第三阶段是未来环印度洋时代, 该区域中经济总量前三就有 2 个, 中国和印度, 港口城市上海、广州、孟买有很大的机会, 非港口城市则有资本、创新、服务、枢纽的潜力。2000 年以前, 全球城市区域与世界港口城市高度匹配, 密切相关; 2000 年后, 全球城市区域开始向金融、创新中心城市转移, 世界核心港口城市与全球城市不再高度吻合。

判断四: 环印度洋地区是中国关键性腹地。前十年也是工业化, 城镇化。未来区域的战略格局如何取决于大国关系, 和国际战略、国家战略相关, 未来战略格局必然是多极化时代。环印度洋地区将成为中国产品的重要市场。中国技术、投资、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向。中国重要的战略物资来源地与运输通道。

大国崛起的战略部署对我国的启示:

(1) 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从环大西洋 - 环太平洋 - 环印度洋相继崛起的过程。世界大国格局随贸易主导权的变迁而逐渐兴起, 从古海丝时代的多极化, 到欧美主导的单极化, 又重新进入 21 世纪新海丝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经历此消彼长的变迁: 古丝绸之路时代, 阿拉伯和亚太地区占主导; 地理大发现时代, 阿拉伯和亚太地区地位下降, 欧洲地位上升; 工业革命时代, 北美(美国)地位上升; 新时代, 欧美、亚太发展。国家战略应适应全球格局的变化。更加关注环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地位, 世界格局从单极走向多极。

(2) 不同时代有不同输出, 过去依托港口的沿海产品贸易, 未来也要依靠内陆发展的产品和技术输出, 要学习欧洲德国引导内陆城市发展。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 所谓的梯度转移是转移不了的, 要转变为内陆城市的国际化, 产品走出去,

国家才能实现均衡发展。英国有很多传统的港口城市在衰落, 而内陆城市, 如伯明翰、曼切斯特、利物浦在崛起; 德国传统的汉堡港口最发达, 现在是鲁尔区、法兰区, 莫妮河地区的内陆发展非常快, 加上莱茵河流域水陆通道推动流域经济与城市崛起。中国要借鉴德国, 不是简单的沿海城市战略, 而是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的互动发展, 大国战略强调的国际战略和国家战略的相关性。

(3) 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一起的。美国空间战略条件最好, 东西两大洋, 南北无强敌, 发展战略更多是不同阶段形成不同导向, 形成了三个扇面的产业发展。中国跟美国不一样, 中国有区域化, 一个区域两三亿人口, 且相对交易成本高。对于中国而言, 不仅是产品输出, 要有资本输出, 文化创新, 核心是建立价值共同体, 通过国际战略带动国内发展, 通过与新加坡、巴基斯坦、中蒙、土耳其、伊朗的联系, 形成新扇面格局, 逐渐实现联盟国家, 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二、关于长江经济带

一带一路靠长江经济带连接起来。中国在南北纵向联系多一点 横向联系少, 长江经济带更多是从国内发展角度出发。长江经济带范围包括: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 11 省市, 沿线共 216 个城市, 面积约 205 万平方公里, 约占国土面积 20%; 城镇化率为 53%, 与全国城镇化水平持平; 其中人口 5.8 亿人, 占全国的 42%; GDP 达 26 万亿元, 占全国的 41%。

目前, 需要研究五个方面的有利于: 经济怎么增长, 空间怎么优化, 区域怎么协作, 对外怎么开放, 生态怎么协调。一是全国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扩展, 产业结构要优化沿江内陆地区, 经济体质优化升级; 二是空间布局; 三是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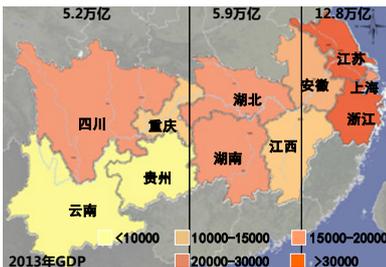
结构，跨区域合作，缩小中东西部发展；四是对外开放；五是保护生产环境。国发文件里面还有四个定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行的对内对外开放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进文化带。这个定位跟前面讲的五个有利于有强关联。

长江经济带问题梳理，也包括五方面：中东西发展差异大，缺乏协调，能力没有发挥，交通没有形成，生态环境压力大。

一是中东西发展差异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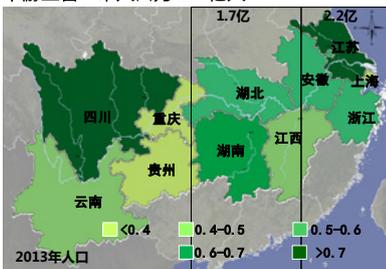
(1) 经济总量：

上游三省一市 GDP 为 5.2 万亿元
中游三省 GDP 为 5.9 万亿元
下游三省一市 GDP 为 12.8 万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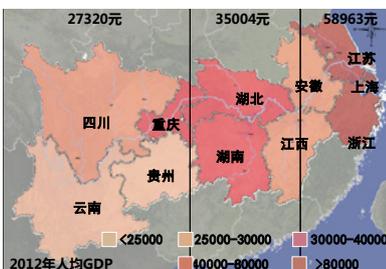
(2) 人口总量：

上游三省一市人口为 1.9 亿人
中游三省人口为 1.7 亿人
下游三省一市人口为 2.2 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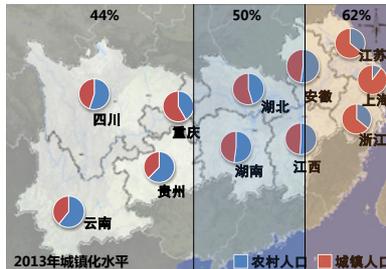
(3) 人均 GDP：

上游三省一市人均 GDP 为 2.7 万元
中游三省人均 GDP 为 3.5 万元
下游三省一市人均 GDP 为 5.9 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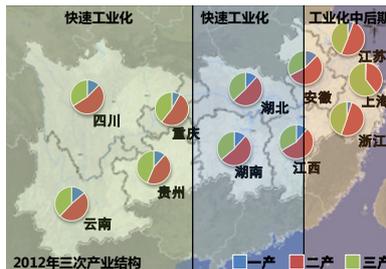
(4) 城镇化水平：

上游三省一市城镇化率为 44%
中游三省城镇化率为 50%
下游三省一市城镇化率为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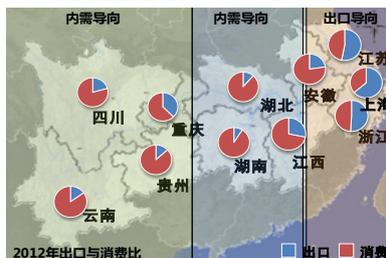
(5) 工业化阶段：

上游三次产业比重为 12 : 51 : 37
中游三次产业比重为 11 : 53 : 36
下游三次产业比重为 5 : 50 : 45
中上游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下游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上海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



(6) 模式导向：

上游出口与消费比为 23 : 77
中游出口与消费比为 16 : 84
下游出口与消费比为 52 : 48
中上游内需导向明显，下游出口稍微占优



二是城镇空间格局缺乏协调。九省两市规划梳理，不成系统，看不到长江经济带的内在。国家层面上缺少长江经济带系统化发展战略，国家新区东部有 2 个，西部有 3 个，中部没有；国家示范区，中下游有；在省域空间布局上，发展方向和重点各自为政，局限于各自行政区划范围内。

三是经济活动受制于通行能力。(一) 长江干线航段实际利用率为 30%，现状

运能不及实际运能十分之一。上游航道通行能力及陆路集疏运能力不足，制约港口发展；中游受桥梁、航道等因素制约，发展受限。(二) 东西向沿江通道贯通性不强。沪汉蓉高速铁路等级较低，宜昌—利川段尚未通动车，高速通道尚未贯通，作为东西复合交通通道的建设是未来重点。(三) 南北向大通道连通性有待提升。重庆—贵阳高铁、武汉—南昌高铁尚未建成。

四是生态环境差，环境保护压力大。

现在上海最大问题就是水，北京最大问题是空气。污水排污量逐年增加，长江水库水治理难度大。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持续增加，已经超过全国 40%。另一就是沿江重化产业过度集聚，沿江分布全国六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以及众多石油化工基地。

分析未来趋势，有如下初步判断：

1、我国国家区域化格局明显不同于美国，美国是一个分工的区域化，我们是一个功能组合一体的区域化。也就是产业区域化趋势，而非梯度转移趋势。以汽车产业为例，需要典型的区域化布局的产业，讲求零库存，配件供应就近化。如雪佛兰品牌 80% 配套企业位于上海 300 公里交通圈内，90% 配套企业位于 500 公里交通圈。日化、高新、物流、服务等企业呈现区域化布局，这是未来产业发展和城镇群的认识，城市区域性联系紧密，区域性城镇群显现，如武汉在中三角的关联网络。(图 1)

2、未来人口大增长已经不是那么现实。具体情况是，上游省份云南、贵州、四川人口净流动减缓，重庆人口回流显现；中游省份湖北、湖南人口回流显现；下游省份江苏、浙江人口净流入减少，上海净流入增加减缓。

3、自主创新。国家已经批了 8 个自主创业示范区，5 个都在长江经济带上，还有北京、天津、深圳。在五百强企业在中国的布局中，浙江第一，不仅面积大，

而且有阿里巴巴这些自主创新品牌；上海第二，江苏第三。中国民营品牌500强中，长江经济带沿线拥有173个，占比1/3以上。（图2）

4、长江航运一体化。（一）港口整合。港口资源整合符合我国港口由“粗放式的规模化”向“集约化”方向转变的大趋势。（二）新三峡船型将一次过闸船舶吨位提升至26000吨，比原来提高60%以上，极大提升了过闸效率和上游航运能力。通过江海直达，近期实现南京以下航道；中期实现武汉以下航道；远期可探索重庆至武汉段。此外，武汉的航运中转地位增强，作为中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将加强。

接下来，对空间演进的理论逻辑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1、从沿海经济到流域经济

陆大道（1984）先生提出了长江经济带。从长江沿岸产业带到长江流域经济。并提出了构建我国经济发展的T型结构。

这样的流域经济已有先例。欧洲莱茵河流域，全长1232KM。沿线主要是德国和荷兰。依托资源（煤炭磷矿资源，进口铁矿资源）形成发达的工业体系。以城市或港口为中心，形成连片的工业区，包括鲁尔地区、莱茵-美因工业区，连体双港为中心的工业区，斯图加特工业企业等。

长江经济带，不是简单的雁形与梯度转移，因为它的梯度转移，雁形发展并没有完全沿着长江经济带展开。平行区域化的格局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在区域内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当然区域之间的等级、流域网络会在不同价值区段上展开。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逻辑大于沿线工业体系的逻辑。

2、从核心-外围结构到韦伯结构

核心-边缘理论由J.R.弗里德曼创立。他认为核心区是社会地域组织的一个次系统，能产生和吸引大量的革新；边缘区是另一个次系统，与核心区相互依存，

城市三级关联网络：

第一层级：长沙；
第二层级：宜昌、南昌；
第三层级：襄阳等省内城市；

区域关联层级：

第一层级：湖北（55%）；
第二层级：湖南（30%）；
第三层级：江西；

注：企业总部分支法，根据企业总部及其分支机构设置数量分析城市关联度。资料来源：2010年工业局注册企业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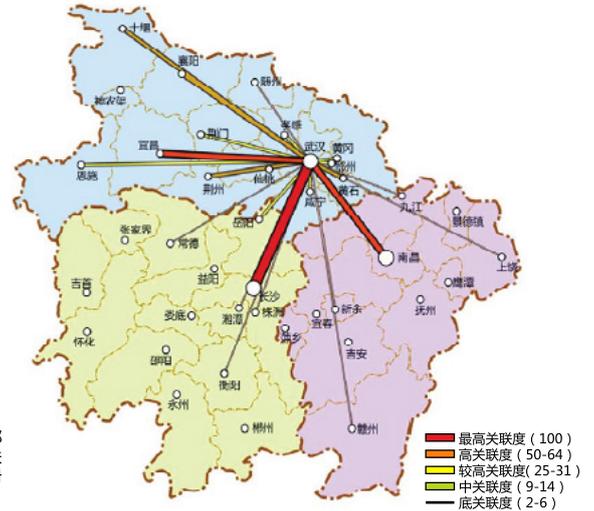


图1，武汉在中三角的关联网络



图2，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分布图

其发展方向主要取决于核心区。核心区和边缘区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边缘地区分为上过渡区域和下过渡区域。潜力地区与外围地区。

“韦伯结构”理论强调，点和点相互联系所形成的结构。在空间上强节点、通道。在功能上强调流、等级与网络。卡斯特尔的“流”的理论，强调流与价值区段。在区域内既存在核心-边缘理论，但这种核心边缘结构更向着更扁平化、网络化的韦伯结构转变。

结合以上梳理，提出以下建议：包

括优化布局、创新产业体系，交通走廊、长江的经济城镇化，污水治理。

1、优化空间布局，结构优化。（1）一带两廊。沪汉蓉发展廊道：重点建设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四大综合枢纽，复合长江航运中心和区域枢纽机场职能。沪昆发展廊道：增强东西贯通（长沙-贵阳-昆明高铁）和南北联系（重庆-贵阳、武汉-南昌高铁）。（2）三区四群。三区分别是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上游总体空间结构为两群三带；核心城市与核心地区分别是成渝贵城镇群地区、滇中地

区；三条主要轴带为：沿江发展轴、沪昆发展轴、对外开放轴（广元-重庆-贵阳-南宁）。中游总体空间结构是一群多带；一群是以武汉为中心城市的中游城市群，以长沙、南昌为区域中心城市，宜昌、岳阳、九江为区域副中心城市；多条发展走廊分别为：沪汉蓉通道、沪昆通道、京广通道和京九通道。并最终构建成武汉、岳阳、长沙、南昌、九江紧密联系的五边形地区。下游总体空间结构为两群六廊；分别是两大城镇群：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宁合芜城镇群；六条主要经济走廊：京沪通道、沪昆通道、沿海通道、沿江通道、华东第二通道、东陇海通道。四群分别是：成渝城镇群、中三角城镇群、宁合芜城镇群、上海全球城市区域。

2、创新产业发展模式。

(1) 空间上以上海、武汉、重庆-成都为龙头，构建主导产业鲜明的区域化产业体系。(2) 动力上推进上海张江、武汉东湖、长株潭、苏南、合芜蚌自主创新示范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浙江海洋经济示范区的建设；开展武汉、合肥、南京、杭州、长沙等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现代服务业中心。(3) 模式上关注出口与内需两个导向。中上游以内需为主，加强出口，推动内陆城市国际化。下游以出口为主，加强内需；同时强化全球城市区域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龙头。

3、构建复合型交通走廊，提升长江现代航运功能。

(1) 航道建设。建四大航运中心，将上海、南京、武汉、重庆这四城的国际机场、铁路和航运结合起来，形成长江经济带要建四大区域性交通枢纽。(2) 完善长江立体交通综合枢纽，包括4个复合型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和5个区域型综合交通枢纽。(图3)(3) 构建复合型交通衔接走廊。长三角城镇群：打造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合肥为副中心，城际铁路为主通道的城际交通网络。长江中游城镇群：构建以武汉、长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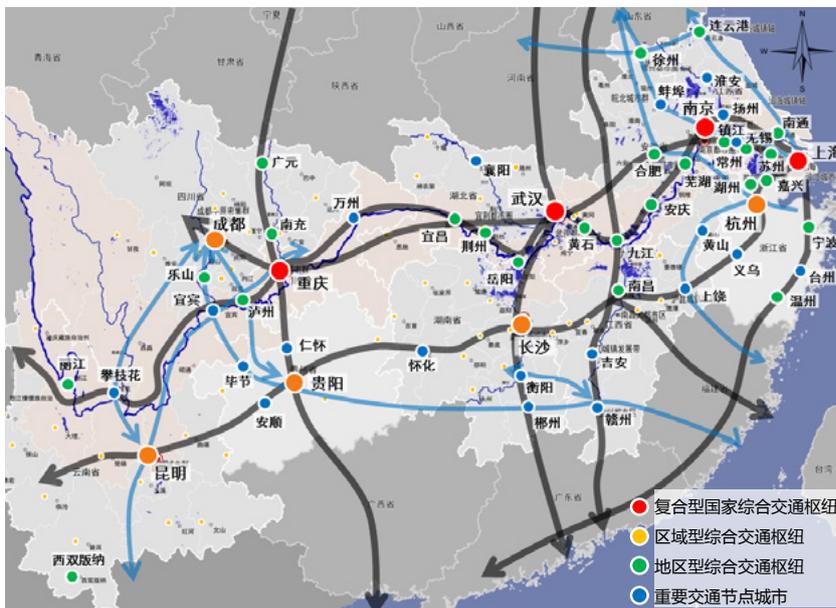


图3，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南昌为核心快速铁路为主通道的的城际网络。成渝城市群：建设以重庆成都为中心，铁路客专为主通道的放射状城际网络。

4、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控制和治理水污染。

长江经济带既是国家重要的发展经济带，也是贫困最集中地带。现在国家已经从过去的贫困县试点转向了区域集中连片贫困试点。希望通过文化和特色整合，寻找特色城镇化之路。(1) 实行严格的流域水资源管理制度，统筹水资源利用和污水排放。(2) 加强重点水体的水质监测和综合治理，强化重点水域保护。(3) 加强流域重点生态敏感区：太湖、巢湖、鄱阳湖、洞庭湖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和保护，并探索建立沿江国家公园。

5、全国有14个国家连片贫困地区，

其中有8处涉及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要结合扶贫和资源保护探寻特色的城镇化模式。在文化及旅游资源丰富地区，要保护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同时，振兴文化艺术，并凸显地方特色。

三、小结

区域经济空间的演变是一定发展阶

段的国家空间战略。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国家的空间战略出现了新的趋势：走出去，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引进来，以长江经济带为核心，从沿海经济转向流域经济。

长江经济带发展过去的发展思路是希望通过“梯度转移”和“雁形发展”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空间的布局，现在看来全球网络的分工体系与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的“区域化”趋势更应该引起重视。

区域经济地理传统上是一种核心-边缘结构，而这种结构在全球化、区域化、网络化的影响下，基于点对点与流的韦伯结构是一种新的趋势。

未来长江经济带会构筑“一带两廊，三区四群”的新格局，并以此为基础来化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交通体系、生态保护。挖掘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文化保护地区的特色城镇化。

(文字整理：合作交流办)

2015《城影相间》 摄影展作品征集



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影像学术委员会主办、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的2015《城影相间》摄影展，将于2015年9月下旬在贵阳与上海两地同时开展。分别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的“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和上海市举办的“首届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艺术季”两个大型学术活动上展出。

本次展览秉承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的主题“新常态：传承与变革”、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艺术季的主题“城市更新”，以及“促进公众广泛参与城市评论”的理念，旨在借助城市影像的媒介，提升城市公共空间艺术的发展、推进市民参加、拓展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学术活动。

现在，我们热情的向您发出摄影作品征集邀请，您的积极参与，将会使这项活动更精彩！

2015年展览主题“传承与变革”

本次作品征集要求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以“传承与变革”为主题，以纪实和人文类的影像作品，反映对当下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取得的成就、矛盾、问题的思考。本次作品征集原则上谢绝动物、植物、微距、自然风光等主题类的作品。

作品征集范围

本次展览作品征集面向中国（含港、澳、台）的规划师、建筑师和相关专业人士、以及城市影像爱好者。

作品征集时间

自2015年5月18日发布之日起接受投稿，至2015年6月21日24时截止（以电子邮件发出时间为准）。

作品征集要求

本次作品征集原则上要求主题鲜明的组照，但优秀的单幅作品亦可，彩色、黑白；胶片和数字作品不限。投稿作品请提交长边不小于1600、分辨率300dpi的数字文件，由专家评审小组评选，评选录用后，需提交高精度TIFF格式文件（文件大小应不小于30兆、分辨率300dpi），由主办方统一输出、制作。

所有参加征集的作品，原则上仅可做亮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等适度调整。如为表达创作思想而对原始照片做出合成、添加、大幅度改变色彩等技术处理，请做出说明，谢绝电脑创意作品。

每位作者限投最多两组组照作品，每组组照作品照片数量应限制在6—12张，或限投两幅单幅作品参加评选。每组（幅）作品均需附有一份不超过500字的说明。参加者需填写作者的简介表格（见下载链接）。作品应以rar压缩格式作为附件文件的形式，以电子邮件发往：image@planning.org.cn

评选办法

本次展览组委会将邀请城乡规划学、摄影学及艺术界的知名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小组进行评选，专家评审小组名单另行公布。入选的参展作品和作者名单将于2015年7月10日前公布。

参展作品的相关权益

入选参展的作品将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颁发证书。部分参展作者将获邀参加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艺术季中本项影展的开幕式、或参加2015年城市影像学术委员会举办的学术研讨会。

主办方拥有参展作品的有限使用权，包括：在展览及宣传期间，可以将作品压缩文件置于互联网展示，或刊载于报纸、期刊以及展览和评选活动的相关材料中；可以将作品用于和展览、展示相关的宣传手册以及编辑出版展览图册及相关研究文集等。

部分参展作品将在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做公益拍卖，所得费用将捐赠给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西部行”公益项目。所有参展作品不会用于其他商业用途，作品的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参展者应保证其参展作品由参展者本人独立创作完成，且保证参展作品不出现任何侵犯他人权益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侵犯他人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因上述侵权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参展者本人承担。

参展者同意主办方拥有本次活动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凡投稿的作者，均视为同意并遵守以上各条规定。凡不符合征稿要求的作品将取消参评和展览资格。

本次展览组委会组织架构

主 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影像学术委员会 / 承 办：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策展人：王伟强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影像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学术主持：鲍露 视觉文化批评家、著名策展人 / 张婧 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主任、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策展人 / 杨保军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彭震伟

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兼任国际人居工程与设计学会主席（2013 - 2014 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高等教育城乡规划专业评估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城市规划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兼城市规划专业学位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近一年来，上海与长三角区域城市群协同发展的议题受到广泛关注，上海市规土局、上海市发改委和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都就此展开了不同视角的研究，分别为：“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上海市‘十三五’规划”和“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长三角要打造世界级的城市群，从各个角度来说，其围绕的核心就是上海要发展成为全球城市。

1、长三角城市群地域基本状况解读

岁月变迁，长三角区域边界和范围也在不断的变化。从国家层面来看，最初是江浙沪两省一市，城市群则是指上海、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南通和浙江的杭州、绍兴、湖州、嘉兴、宁波、舟山、台州等16个城市。

随着经济发展和交通联系的加强，安徽积极要求加入，使得该区域变得更加复杂，包括安徽在内的三省一市总计3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6%；人口数量2.18亿人，占全国的16.1%；经济总量占全国接近1/4。我们的研究认为，调整后的长三角城市群应纳入安徽东部的芜湖、马鞍山、宣城、铜陵、合肥、

滁州，以及浙江南部的温州，形成包括23个城市的新城市群，面积19.15万平方公里，人口1.38亿人。长三角的核心地区则是原来的16个城市。在这一区域中，除了围绕上海形成中心关系外，更需要关注安徽、浙南、浙西、苏中和苏北各自次区域的发展及其城镇体系。

目前来看，就三省一市范围整体而言，区域内部差异大，缺少协调机制，上海辐射带动整个长三角区域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2、全球城市区域的对比研究

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世界级城市群，都处在较高的城市化水平阶段，是经济发达和人口、就业高度集中的国家中枢地区。与之比较，上海和长三角的实力能级相对较弱，发展水平还处于被动接受外来要素的相对低端的发展阶段。

2.1、从城市体系来看，世界级城市群往往具有明确的等级分工体系、成熟的空间结构和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

全球城市区域强调竞争和合作，同一平台上城市之间的职能分工清晰，人口、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的空间安排合理。基础设施网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骨架和基

础，从美国、日本的大城市群可以看出基础设施网络带动并形成了核心和走廊，而欧洲的交通可达性则催生出多中心的城市系统。丰富的次级区域城市群显示出城市群发育完善程度，如兰斯塔德城市群，由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3个大城市，乌德支列、哈勒姆、莱登3个中等城市和众多小城市构成一个发育成熟的多中心体系。

相比之下，长三角城市群则缺乏明确的职能分工，空间结构较为松散，内部次级区域发展尚未完善。从上海市域角度，我们提出要构建新型区域关系，加强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大力推进松江、青浦、嘉定、临港新城等次级区域的城镇体系与中心体系完善，形成基于协同合作的扁平化的城市网络体系。

2.2、是从产业特征来看，世界级城市群往往具有更成熟的产业结构、集中高价值区段产业与就业分布，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经济联系度高。

2010年统计数据 displays，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内部三产比重普遍超过60%，而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中只有沪、宁、杭三个城市进入第三产业主导阶段。随着全球化之后产业组织方式改变，产业

选择按价值链判断，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更具竞争力。而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主导产业仍主要是低端制造业，主导产业重构性较高，缺乏协调，产业升级尤为急迫。此外，城市参与全球发展体系的程度也是重要的判断指标，金融区、保税区的价值即在于此。从全球城市指数（CCI）2012 报告中可以看到，长三角城市群在数量、网络关联方面都明显偏弱。

2.3、是从社会分化来看，世界级城市群分化迥异，差异明显。

大型城市群是一种国家战略，在美国 2050 发展战略中，更多地关注地域中交通、基础设施的联系，关注未来水资源、能源的可持续性，其所覆盖的 11 个巨型城市地区涵盖了全美国的核心区域。

在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区域协同机制方面缺乏充分有效的立法保障。如何降低社会分化程度，促进多元主体区域一体化发展是未来区域规划的重点。这次国家“十三五”重大科技计划指南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如何加强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这里既包含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协同，也包含城市群之间在更大范围的协同发展。

2.4、是从核心城市和门户港口的关键性作用来看，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向外连接全球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起着双重扇面的作用。

普华永道发布的《城市发展机遇 2014》报告显示，上海在世界城市中位列属中后，在技术普及速度、环境可持续发展、商务氛围、成本机遇等方面都处于低水平范围，与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世界城市有较大差距。港口发展是世界级城市的重要组成，同一区域内港口的区域性治理协调很重要。长三角港口区域分割壁垒限制明显，同质化竞争、海事服务业滞后等问题严重，与世界级港口群有

较大差距。

3、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总体演化特征

城市群功能结构体系不断完善，上海成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发挥着两个扇面的作用。全球化、市场化与区域化导致区域城市功能的重构，引领生产要素区域化重组态势明显。城市间的联系以“流”的形式得到强化与拓展。上海成为全球跨国公司进入长三角的门户城市，不断重塑、强化着自身的区域腹地范围，同时，通过梳理长三角城市群内 23 个城市的核心功能和城市定位，可以看出多样化的城市职能分工体系已开始初步形成。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化重组，总体上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反“K”字型多中心空间结构。城市功能落到空间上，形成了明显的点轴格局，集聚程度明显，中心向外递减。长三角区域中有两条强城镇发展带，即沿江发展带（包含了传统沪宁一线密集城市发展带和沿杭州湾发展带，以及一条弱城镇发展带，即沿海一线，主要集中在浙江的温台甬一线，江苏沿海一带态势不明显，形成了反“K”空间结构。但点轴格局未来会向着网络化去发展，形成高低等级城市的竞合和地区差异化发展路径。

城市体系中各级城市规模不断提升，数量减小，规模集聚效应突显。通过统计分析，长三角城市群 23 个地级以上城市中，87%（20 个）处于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阶段，百万人口以上城市是长三角城镇人口聚集的核心，经济规模效益突出，城镇化与郊区化并行。县城和中小城镇成为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外来人口本地化吸纳的最重要载体。

“中心 - 边缘”的发展规律与结构关系在城市群内部得以深化，推动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区域一体化的表现形式为产业扩散、人口流动、交通强化与物流体系的建立等方面。由于多方面因素，形成了长

三角核心地区（上海、苏南、浙北、浙东地区）与外围地区（苏北、安徽大部分地区、浙西南地区）。

次区域竞争与合作态势突出，竞合关系在多个城市政府层级间展开。次区域的中心城市极力拓展自身的经济辐射腹地范围，实力较小的城市寻找自身的经济板块，寻求合力发展（竞争力的重组），城市与地区性战略规划明显增多，城市间的战略合作普遍增多。

形成了基于地方化的多元城镇化发展模式与路径。动力机制的差异带来了多样化的发展方式与差异化的城镇化水平。

4、长三角区域城市群发展构想

4.1、发展趋势

从长三角地区发展态势和演变规律来看，经济全球化是重要方向。在此方向的基础上，应优化产业结构，共建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和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构筑世界级城市群。强调“城是城，乡是乡”的城乡一体化，探索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保障的均等化。应实现低碳化发展，促进资源集约与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

4.2、目标定位

以上海为核心的全球级城市群。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明确指出，长三角的发展目标是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肩负着带动内地发展、参与全球竞争的国家使命，上海是兼具地理区位和全球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的核心城市。

全球先进的制造业基地与重要服务中心。在成本和环境倒逼下，沿海地区制造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加快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及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4.3、总体发展思路

城镇协同发展：“网络化+发展极”的空间结构。网络化，基于功能形成的城镇间的网络化联系与次级城镇群并接入全球网络体系之中。发展极，多种功能以及不同能级的多类型的城市发展极。

交通高效衔接：构建基于高铁网络的长三角一日交通圈。多类型、低成本、大流量与快速化的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城际轨道加密；城市间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与分工协作；城市内部各类交通转换衔接，降低共同承受的运行成本。

产业分工协同：构筑专业化城市，形成地方性的产业特色。突显地方禀赋优势，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功能专业分工，推动多元产业发展政策，划分核心区-潜力区-外围区。

生态紧密互动：构筑区域生态网络系统。实行土地集约化发展，控制区域的蓝绿系统，编制区域性生态规划，建立区域生态协同保护机制，清晰界定权利边界。

社会广泛融合：建设包容性的国际都市。提倡多种文化交流与共存，保持城市的包容性与多样性，为创新与交流提供一个宽容、自由的环境。

分区政策引导：建立差异有序的空间引导体系。识别与划定长三角核心区、潜力区与外围区，确定合理空间体系与产业分工体系，通过分区政策，引导城镇与经济的协同发展与人口的有序流动。

5、上海与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

5.1、上海在区域中的多层次定位

上海历来具有“衔接内外、兼收并蓄”的国际化特质，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枢纽与依托。上海不是通过本土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拓展扩散，而是借助于全球商品链和要素链的延伸建立联系和融入的全球城市。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城市”，并随着国家政策层面的逐步调整明朗，上海的核心地位和带头作用将更加突出。上海与北京、

广州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与错位。上海作为国际化城市的“世界之窗”由来已久，但其引领作用有待提升。

5.2、上海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一是对外控制与对接。核心思想及目标是国家层面的全球战略，通过航运中心和港口物流中心的打造，集聚全球资源；通过先进制造业发展和服务完善对接国际市场；通过文化打造与城市魅力激发，吸引国际人才。

二是对内服务与引领。带动与联合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创造更多区域共享的机会和利益发展，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5.3、上海大都市区的发展设想

近期向西、向南的环湖沿湾发展：包括上海市域、江苏的苏州市区以及浙江嘉兴市域内的嘉善、平湖和嘉兴市的连续空间，距上海中心约100公里范围内，单程交通1小时，面积约9000平方公里，人口规模2700万人。强化西北沪宁轴向协同发展，西南重点协调沪杭高铁沿线城镇，并应关注环淀山湖地区空间发展和管制。

远期向南、向北沿湾跨海发展：包括北部长江入海口的启东、海门、通州和张家港、常熟、太仓、宝山、浦东、崇明的沿江空间，和南部环杭州湾连接浦东临港新城—嵊泗—舟山—宁波的海湾、海洋空间。重点考虑战略性机场、港口等重大功能性设施集聚带建设。

5.4、沿沪地区发展设想

沿沪地区主要指上海周边县级市（区），旨在推动上海大都市区各城市（区）之间在一体化发展基础上实现“无缝对接”，促进上海大都市区实现结构转型、能级提升，进而带领长三角地区进入多中心联动的整合阶段。

沿沪地区协同发展策略，一是协调共赢机制，建立“上海大都市区协调机构——次区域（环湖、环湾、北部区域）发展指挥部——地方政府（市、区一级）”三级协调机制。二是城乡空间一体，国家层面以行政综合手段明确以上海大都市区为空间载体，重点关注跨界城镇和地区的整合和统筹。三是道路交通衔接，在大都市区范围内构建城市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常规公交等完善、高效的公共交通体系，扩大通勤圈；区域内部道路在功能、等级上整体协调。四是基础设施共享，统一设置给排水设施和垃圾填埋场，打造区域一体化信息通讯网络平台，整合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医疗、教育），促进资源共享。五是生态环境共护，突破行政边界，划定生态边界，强化土地分区管制。

5.5、上海市域范围空间发展设想

2001年上海推进郊区城镇规划，即“一城九镇”；2005年的“1966”城乡规划体系，加大了郊区发展。未来上海应重视城镇群体的发展，上海是由若干个多层级的城镇群及其核心所构成，如松江的周围会形成合理分工合作的城镇体系、交通体系和基础设施网络。建议上海未来构建市域西部城镇群、南部环杭州湾北岸城镇群，相对独立，与中心城合作平等。宝山、闵行将会形成两个依附于中心城的主城区的组成部分，而虹桥商务区和以迪斯尼为依托的川沙地区也最有可能成为上海主城区的新的组成部分。

（文字整理：合作交流办）

更正：

上期（2015年02期）P27页刊登的“优秀集体奖”获奖团队未完整表述。更正为：“援疆团队：规划设计一所/三所/四所/五所/六所/十所、城开分院、创研中心”。

同济规划简讯编辑部

精英讲坛集锦

文字编辑 > 本刊编辑部

以生态理念为引导的城市设计



匡晓明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二所所长

关键词：生态城市设计、有机聚合

“城市设计是 design, 不是 plan”, 城市设计要解决城市中一些宏大的问题, 但同时也必须要有一些创意的东西。在这样的思考中, 以“有机聚合”为主体的规划思想与理论应运而生。通过“城绿融合的生态网络”、“复合平衡的密度组团”以及“多元文化的时空拼贴”, 构建城市设计的生态和谐观。

与传统城市设计相比, 生态城市设计的“转型”十分突出而明显。首先设计目标发生了转变: 从城市环境营造转变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设计对象的转变: 从三维城市空间到空间、社会、经济、环境、管理的多元结合; 以及设计方法的转变: 从线性规划到复合整体的空间网络规划。

生态城市设计在策略上的创新要素: 一、城市空间形态和功能格局紧凑复合, 以适宜的规模和尺度, 在合理的半径内解决相应的问题。二、在空间形态的表现上, 强调生态网络的构建, 规划按照已有的机理进行建构, 形成与自然有机融合的空间布局; 并解决碳汇和排氧量的问题, 提升固碳能力。三、物理环境优化。遵循生态优先等原则, 将自然途径与人工措施相结合。四、行为活动支持: 鼓励绿色出行, 完善慢行交通系统, 改变日常交通方式, 优化公共交通设施, 以公共交通组织导向高密度的发展模式; 并将地块功能混合利用, 减少居民出行需求。五、资源使用效率, 降低电力热力碳排放, 完善固体废物管理, 提高再生水利用效率。

在方法创新上, 以新技术、新方法、新程序来完善生态城市设计。例如在贵州双龙临港经济区规划中运用的“计算机模拟技术”, 使用 Landsat8 软件、ECOTECT 软件、FLUENT 软件对自然环境如地表温度、风行风速、太阳辐射量等进行了分析, 并结合理论让规划设计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做到相对的平衡。在新方法的运用上, 生态城市设计以指标量化、精准控制、法定执行, 构建低碳生态规划指标体系, 对规划、建设各要素进行精准控制, 并通过生态附加图则将建设要求法定化。同时, 生态城市规划的程序, 也在生态的约束下做出相应的调整。

“最少干预的规划”村庄规划实践



周琦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复兴研究中心主任

关键词：最少干预、自治、自建

2013 年“4·20”芦山强烈地震, 四川省宝兴县大溪乡曹家村房屋受损严重。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复兴研究中心义务承担了曹家村的灾后重建规划工作, 并以“最少干预的规划”为原则——调动村民自我评估、自我协调、自我规划、自我发展的积极性来实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曹家村总体格局上是大分散, 小聚集, 依山傍水, 沿山而设。建筑形式基本以穿斗式木结构建筑为主。规划通过对以“贵阳建议”的思路为重建工作基础、以

生态博物馆建设发展思路为重建工作方法和以规划管理实施的村民自治思路为重建工作手段三个基本点的总结, 规划项目组结合县乡政府的意见, 提出“最少干预的规划”这一重建工作原则, 其要点包括: (一) 在政府监督指导下的村庄规划管理自治。(二) 村庄建设的非政治功利性。(三) 克制的规划设计。

“最少干预的规划”的基础是曹家村村民充分自治能力的建设。结合村民的意愿, 在村民委员会下成立了“曹家村灾后重建自建委员会”和“曹家村产业发展自建委员会”。两个委员会一起参与产业发展计划和灾后重建规划的编制和审定, 以及新建住房、旧院落改造更新、院坝建设等的验收和补助资金的发放。

在明确了“山水田园, 生态曹家”这个发展目标以后, 项目组将规划按照“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原则将重建工作分为村民自建和政府重建两个板块, 均采用了滚动编制的方法, 结合村民自建委员会制度建立扶助验收制度。(一) 由重建规划项目组建立规划总体框架, 将重建项目按照实施主体分为村民自建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两类, 明确不同的规划成果深度要求。村民自建项目主要包括住宅及庭院部分, 以导则为主, 辅以适当的现场指导。导则采用“口袋书”的形式, 包含: 平面功能、建筑风貌、设施配套、院落景观四部分, 以图示为主, 配以少量文字解说。(二) 结合示范户的建设, 项目组分别开展导则和实施规划的编制工作。村民按导则自建住房, 政府和项目组在建设过程中提供指导意见; 实施工作按规划展开工作。二者平行进行。(三) 由村民自建委员会接收和汇总规划的实施反馈意见, 并提交规划项目组。项目组按照要求调整

规划，调编结果再次进入村民自建委员会审议流程。（四）由村民自建委员会和乡政府一起对实施结果进行验收，其中签订扶助协议并符合导则要求的新建住房、旧院落改造更新、院坝建设等在通过验收后能够取得约定的扶助资金。

民生尺度：城市历史地区的规划实效性讨论



张恺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四所所长

关键词：民生、为谁规划

民生章节是城市历史地区规划中容易被疏漏的环节，起码在技术编制的层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系列看似雷同的规划图纸的背后，“为谁而规划”似乎没有得到充分的解答。

上海的老城厢以及南疆的莎车老城是城市历史地区规划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案例，在“民居整体动迁”以及“居民全部保留”这两种不同的规划实施方式中，规划的编制要以对历史的理解与社区的演变、传统生活方式的继承之间的渊源关系，作为勾勒民生图景的基础。城市历史地区的规划更多地是一种对既有城市空间的“优化”；从保护原住民及延续传统生活方式的角度来保护老城，可能是最好的出路；并要让遗产成为创造老城居民就业的来源。

在上海老城厢的案例中，居民结构表现出很大的“边缘性”：肇方居委 4000 户户籍居民，失业率为 12%，相比之下，2014 年上海城镇登记失业率在 4.2%。老城厢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个“避难所”，与自己同处于低收入阶层的人群聚集在一起，使他们产生安全感。同时这些居民也极力希望摆脱这个社区，以摆脱自己的“弱势”标签。通过整体拆迁的方式实施这样

一个地区的规划，在看似皆大欢喜的民生成就的背后，究竟谁付出了代价？而“绅士化”的城市更新方式，对于大面上改善历史地区的民生，其效应是相当有限的。

南疆莎车老城是古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镇，是丝绸之路从我国进入中亚地区的转折点，与中亚地区的文化关联度超过与中原地区。城中有 97% 的维吾尔族人，还有大量的手艺人以及中亚移民。城市的空间结构、居民的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性。在这样一个单一民族占主体的特殊文化群落，规划无法草率地代替居民去做判断。传统生活方式和发展意愿对社区配套的诉求是什么，对民居建筑改善的传统观念是什么，对空间的喜好是什么，遗产与生活生产方式的关联是什么，这些在技术层面上表达规划实效性的核心问题，需要借助社区规划的方法，走近居民的生活，换位思考。

基于底线约束和战略引导的总体规划编制



裴新生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三所所长

关键词：刚性管控、柔性应对

在国家转型发展和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面临着发展观念转变、多规融合和博弈、技术方法创新等诸多挑战。既要明确城市发展中的刚性约束条件和保护要求，又要提高规划的弹性和适应能力。

1、刚性管控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我国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刚性管控历经三次大的转变。改革开放到上世纪末，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刚性管控主要突出高程、坡度、地质条件等工程属性；2000-2014 年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土地供需矛盾凸显，偏重于工程

属性的刚性管控手段已无法解决问题，空间管制成为主要管控手段；2014 年以来进入发展新常态时期，资源环境约束使城市规划从增量向存量转变，刚性管控手段和要素趋向多元化，强调生态优先、底线约束、多元保护。

2、新常态下的刚性管控内容

以土地资源、水资源、生态环境为例，阐述新常态下刚性管控的多元化。土地资源的刚性管控主要通过多规合一，协调发改、国土、住建、环保等部门的规划，重点是确定指标和空间落实，统一空间管制分区，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

水资源的刚性管控体现在测算水资源、水环境所能承载的人口规模，作为城市规模控制上限。

3、总体规划中的柔性应对

未来的城市总体规划更强调战略性、政策性和动态性。总体规划要发挥战略引领作用，必须具有柔性应对能力。

（1）资源约束背景下人口增长的弹性应对：上海实践中重视人口规模的弹性，关注人口结构对城市发展的长期影响，同时建立人口、就业、交通等要素叠加的模型模拟人口分布情景，分析时间维度的空间政策导向。

（2）空间布局结构的弹性应对：奎独乌实践中通过构建“污染全面清退、转型发展”、“污染适度清退、优化发展”、“控制新增污染、延续发展”的多情景规划方案，以增强方案的弹性应对能力。

（3）制定行动规划以实现动态应对：上海总体规划的编制非常强调行动规划的重要性，落实总体规划的实施机制，通过近期建设规划及年度实施计划的滚动编制和调控，实现总体规划的动态应对。

本期栏目内容选自“同济规划院精英讲坛”第一期至第四期。
浏览讲座完整内容，请查阅“同济规划 TJUPDI”官方微信。

蚌埠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年）

项目地点：安徽省蚌埠市

设计规模：中心城区城市人口规模上限为 220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上限为 220 平方公里

设计时间：2012 年 4 月起

完成时间：2013 年 12 月；2014 年 10 月，获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复

获奖信息：2014 年度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

负责人：赵民

设计部门：教师规划设计中心

主要成员：赵民、张捷、徐素、顾竹屹、陈阳、朱金、胡魁、古颖、陈晨、邵琳、郝晋伟、黎威、陶诗琦、段瑜卓、张亢、王雅娟、陆希刚、张蓓蓉、张振广、张立、刘欣

1、规划背景

千里淮河与津浦铁路交汇于历史上的皖北重镇——蚌埠。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走过了曾经的辉煌和较长期的低谷。蚌埠作为安徽省首个设市城市，地处中原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区的直接腹地，承东启西，雄踞南北分界线。近年来，又获得了京沪高铁和京福高铁的巨大区位优势。

随着中原经济区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安徽省新一轮城镇体系规划出台，省委省政府对蚌埠提出“重振雄风，再创辉煌，重返安徽第一方阵”的战略要求，方邱湖行洪区的调整也为城市空间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本次总规采取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和公众参与的方式，经历了实施评估、基础调研、规模核定、纲要审查、公示草案、成果专家审查、市规委会审议、市委市政府审议、人大常委会审议、省规委会审议等各环节，获得了各方面的高度认可。

2、主要挑战

从总规实施评估来看，蚌埠市在宏观政策、区位交通、重大基础设施、文化资源等方面具有不可复制的优势；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低谷后，产业升级转型、城市品质仍有待不断提升。区域的公共服务能力方面略显不足。单一水源存在隐患；中心城区近郊地区的开发控制较难。山水本

底优势在城市空间与环境品质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部分区域原有规划内容已不适应现实情况。规划实施程序保障等问题仍有待完善。

结合新的区域环境变化和政策部署，如何利用政策利好优势，落实上层战略安排；如何抓住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机遇；如何响应区域协调发展要求；如何彰显特色提升质量，优化空间结构，成为本轮总规编制面临的巨大挑战。

3、成果创新

包括理念、方法论、技术和应用四个方面。

3.1、理念创新

(1) 将“山水园林城市”写入城市性质，凸显山水本底优势。将生态文明提升到城市性质定位的高度，最大化利用蚌埠在中部地区的山水本底生态优势。

(2) 将文化服务功能写入城市职能，凸显蚌埠的淮河文化、铁路文化、移民文化与近现代工业文明。

(3) 通过强化区域公共服务职能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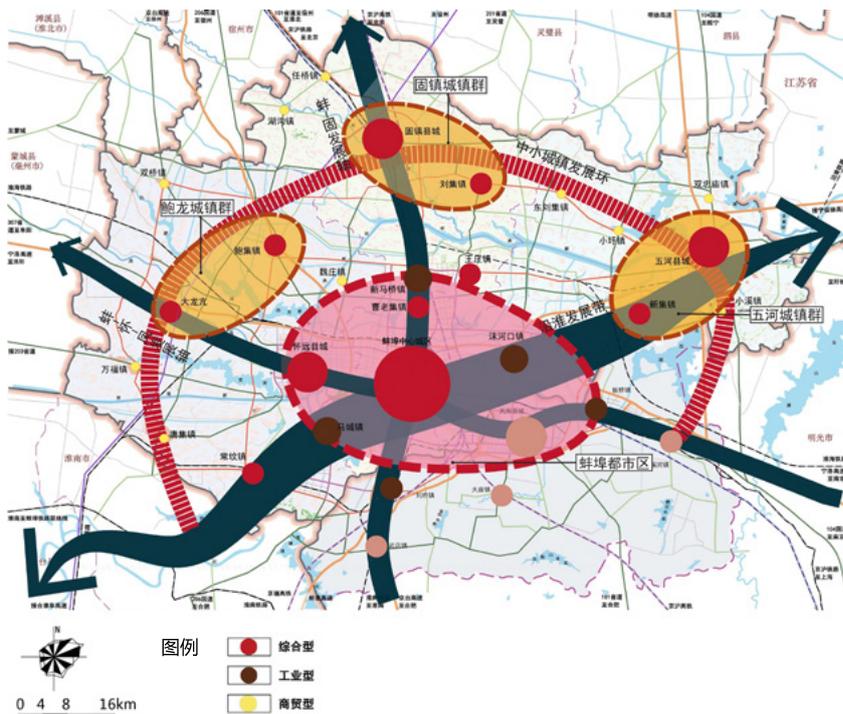


图 1，市域城镇空间结构规划图

现蚌埠的产业转型。注重战略新兴产业与高端现代服务业，凸显蚌埠城市未来创新功能。

(4) 突破行政区划谋求发展空间，提出“蚌埠都市区”空间概念。从规划技术上响应省委省政府希望蚌埠重返“安徽第一方阵”的顶层战略部署。

3.2、方法论特色

深层次和多样化的公众参与机制。综合分析人大报告、政协提案；深度访谈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以及各区县部门；广域的城乡田野调研实现了多重利益团体的参与。多样化的媒体公示、网络征集、规划局专门办公室答疑征集意见等公示、反馈方式，实现了广泛的公众参与。

深度务实的部门合作，专项规划与总体规划实现了“同步启动、优先编制、共同完善”的部门合作方式；高度重视并合理采纳省、市规委会成员单位的专业意见。

本规划初始即组织了高层次的专家研讨，以征集百家之长。

3.3、技术创新

法定规划层次以外的多维度研究，为本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依据。

构建金字塔型的未来城镇格局，突出中心城市强化战略；构建与皖北中心城市定位相匹配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进一步强化区域公共服务职能。

3.4、应用意义

申报新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处：蚌埠火车站与淮河铁路大桥。

提出低碳城市，通过常规公交网络、轻轨、慢行系统等构建低碳城市交通。

为将来解决历史遗留困惑或突破性发展，提供规划技术储备，包括：京沪线和场站的迁建、突破行政区划寻求发展空间、蚌淮凤一体化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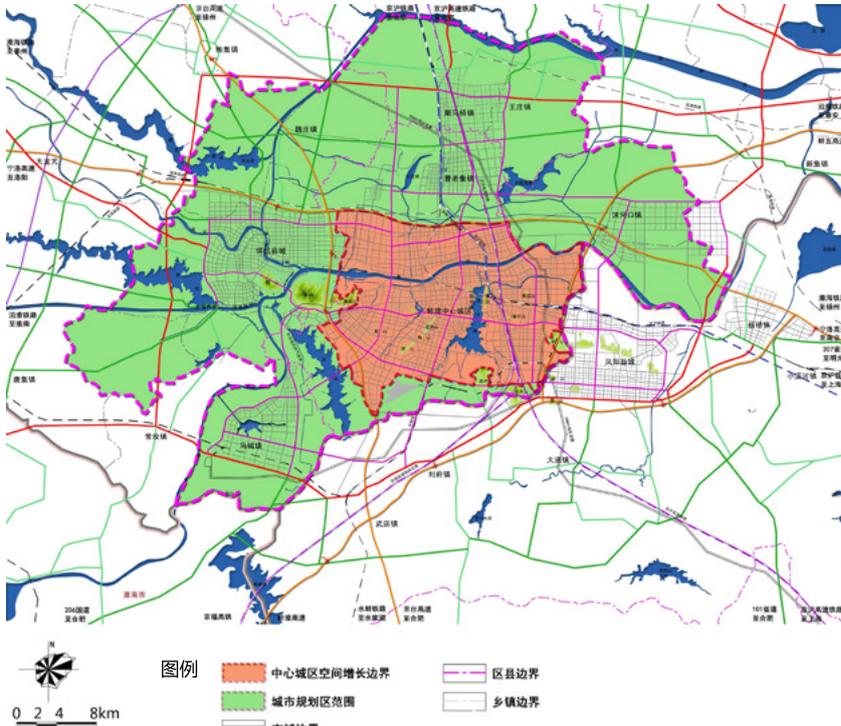


图 2，规划区范围划定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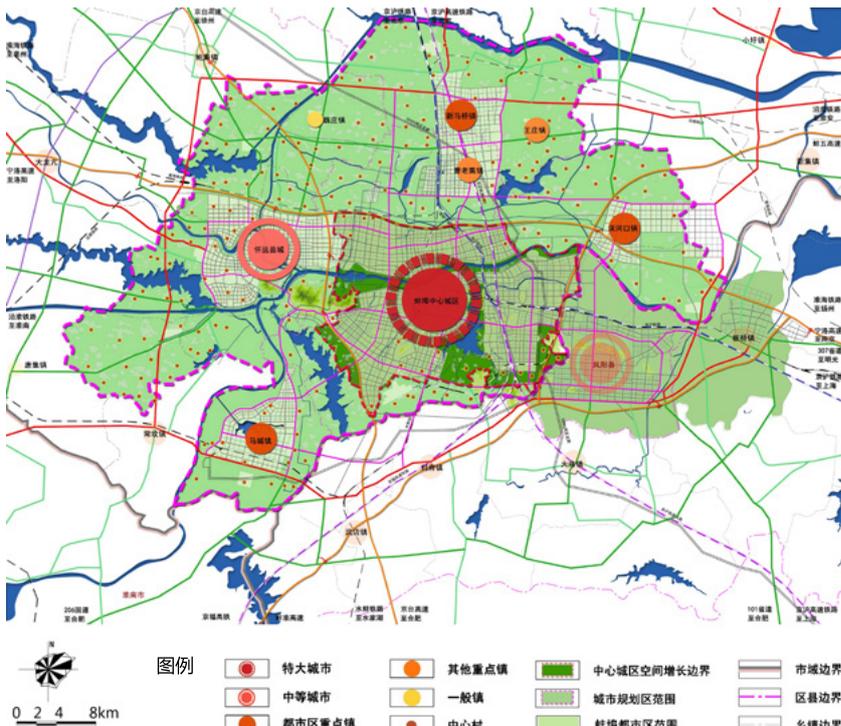


图 3，城市规划区城镇体系发展引导图

4、主要设计内容

4.1、城市性质

华东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和先进制造业基地，淮河流域和皖北地区中心城市，现代化山

水园林城市。

4.2、城市职能

职能一：华东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淮河第一大港，安徽省的交通门户之一。

职能二：电子信息、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精细化工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泛长三角的新型产业基地，皖北对接长三角的领军城市。

职能三：以淮河文化、大禹文化、汉文化、明文化、双墩古人类文化、铁路文化与近现代工业文明为特色的淮畔文明“高地”与文化旅游休闲度假胜地。

职能四：皖北地区的金融服务、商贸物流、教育科技、医疗服务、综合交通和旅游集散中心。

职能五：山水环境优美，城乡服务设施完善，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大城市。

4.3、市域城镇空间结构规划

以城镇化空间集约化发展、区域协

调、城乡统筹为重点，规划形成“一带两轴，一区一环”的空间结构。（图1）

一带：沿淮发展带。是区域、市域层面确定的最重要的城镇发展带，是城镇化空间和功能集约化发展的主体功能带；是工业和第三产业布局的重点；是协调区域发展、拓展城市空间、产业集聚和支撑交通的空间载体。

两轴：蚌-固镇发展轴和蚌-怀-凤发展轴。是蚌埠市依托交通走廊集聚产业与公共服务的带状空间，重点发展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淮卫临港经济开发区、蚌埠工业园区、沫河口工业园、马城经济开发区、蚌埠铜陵现代产业园、怀远经济开发区（包括大龙亢产业园）、五河经济开发区（城南工业园）和固镇经济开发区等9个重大产业区；同时，在发展条件较好的重点镇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一区：蚌埠都市区。包括：蚌埠市区；怀远的县城、马城镇、魏庄镇、古城乡、荆茨乡、找郢乡，五河县的沫河口镇、临北乡；固镇县的新马桥镇、王庄镇；同时

还包括滁州市凤阳县城和板桥镇。蚌埠都市区是蚌埠市的核心增长极区域，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强化蚌埠中心城市职能的主要空间载体，以综合提质、统筹协调为发展重点。

一环：中小城镇发展环。是市域层面重要中小城镇集聚发展环，由市域快速交通环串联起的若干各大中小城镇群组成。

4.4、规划区城镇空间发展引导

城市规划区范围：包括蚌埠市区，怀远县的城关镇、马城镇、找郢乡、荆茨乡、魏庄镇和古城乡，五河县的沫河口镇和临北乡，固镇县的新马桥镇和王庄镇，国土面积为1776平方公里。

蚌埠都市区形成“一核两翼三点”的城镇空间格局。（图2-3）

一核：即一个中心城区。

两翼：即两个县城（怀远县城和凤阳县城）。

三点：即三个工业新镇（马城镇、沫河口镇和新马桥镇）。

（下转第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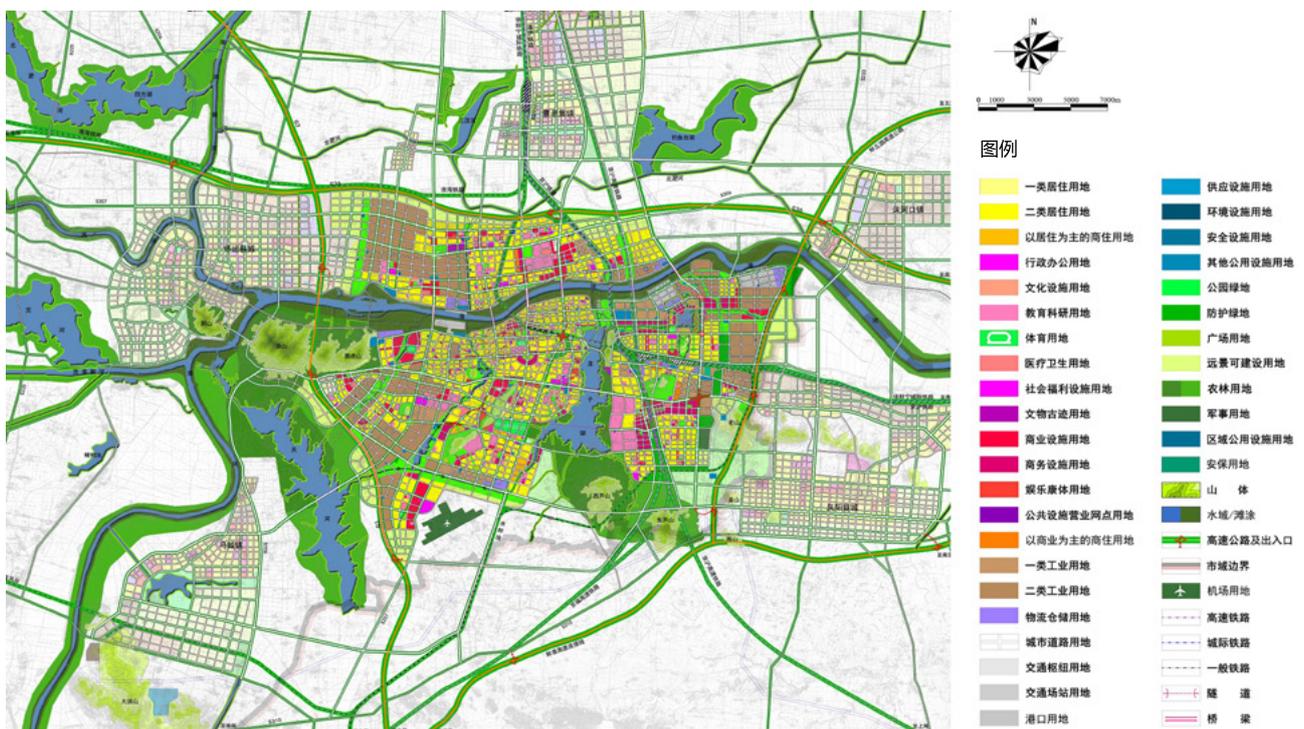


图4，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

吉林省长白县城乡发展规划

项目地点：白山市长白县
 设计规模：2505.96 平方公里
 设计时间：2012 年 11 月
 完成时间：2014 年 5 月
 负责人：彭震伟

团队介绍：本项目由城市规划系彭震伟教授团队与景观学系王云才教授团队联合主创，成员包括彭震伟、王云才、高璟、陆嘉、崔莹、吕东、李鹏、孔祥萍、仇昕晔、石腾飞、邓潇潇、邹琴、傅文、瞿奇等。

1、规划背景与构思

长白县是全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县，坐落于长白山下、鸭绿江畔，与朝鲜两江道首府惠山市隔江相望。作为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中明确划定的“长白山生态功能区”的成员，多年来长白县的发展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吉林省平均水平。2012 年底，基于长白县申报国家重点边境开发开放试验区的契机，规划团队受当地政府委托，深入长白县的城镇和乡村，为长白县现状发展困境把脉，力图探寻边境山区城镇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空间路径，为长白县未来寻求生态驱动、转型发展的广阔空间。

本次城乡发展规划从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整体空间格局入手，放眼于长白县全域空间，提炼出“边境、民族、生态、资源”四大核心优势，反思了长白县的现实困境在于丰富资源与滞后结构之间的矛盾，并细分为失衡的城乡人居结构、滞后的传统产业结构、闭锁的区域交通结构和阻滞的区域生态结构四大主要矛盾。规划因此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绝对优先地位，提出“生态文明是长白县后发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以核心优势的凸显逐步带动解决各方面发展矛盾的总体思路；同时，在国家级开发开放试验区的政策激励下，认为“开发开放是长白县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而“城乡统筹是长白县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保障”，三者紧密结合，全面指导了长白县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心，并由此确定长白县的发展目标为“国家级边境地区山地生态文明示范区”。(图 1)



图 1，长白县域空间发展结构图

2、规划创新点与主要内容

2.1、从边境城市演进的历史规律判断长白发展的阶段、特点和策略

边境城市的发展具有与一般城市不同的历史规律和特征。由于特殊的区域背景，长白县作为边境城市的功能始终停留在跨境物资的简单输入和输出这两方面。边境城市的角色并未对城市的产业升级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直接而明显的推动作用。本次规划认为长白县正处于边贸型城市——边境城市发展的普遍阶段，而未来是否能够从周边同质城市中突围，向综合性边境中心城市转型，将取决于长白县是否能够通过战略导向的宏观部署，以新木桶理论为依据，有效地扬长避短，实践正确的发展战略。

同时，基于国家级边境重点开发开放

试验区的政策利好，规划借鉴自由贸易区的实施政策和理念，对长白开发开放试验区的体制机制构建进行了全面的构想，提出了开发开放试验区发展的演进阶段和政策要求，并配套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实施重点和空间布局构想，从而完整描绘了长白县作为边境城市的发展脉络和未来图景。

2.2、从跨国区域合作的地理维度分析长白发展的未来情景

受制于多变的外部环境，中朝边境线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布局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次规划对中朝边境的沿线城镇进行了全面分析，梳理了鸭绿江和图们江对周边城镇的组织和串联功能，提出了鸭绿江 - 图们江三大跨国城镇群的空间组织结构。中朝边境城镇组织的特点

是以大量中小型城镇为节点，组成了三个规模较为一致、发展程度不一的跨国城镇群。在南北两个城镇群日渐成形的背景下，中部城镇群的构建则尚显乏力。

规划认为中部城镇群的主体是中国的白山与通化两市以及朝鲜的两江与慈江两道。而长白县城与朝鲜两江道首府惠山市区隔江相望，是中朝边境空间距离最为密切的两个地区首府城市。因此长白县被列为国家级边境开发开放试验区，正是着眼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将可能成为未来中朝边境中部城镇群的桥头堡，与朝鲜惠山市形成无缝连接的跨国“双子城”，全面带动中朝边境中部城镇群的发展。

2.3. 从人居环境生态适宜性分析出发，构建长白县生态安全格局

人居环境生态适宜性分析是以选择生态敏感地区适合人居环境布局的空间，区分并划定生态保护区域为目标的生态分析方法。本次规划通过对坡度、高程、地质条件、植被分布、水系等因子的综合分析，构建了多目标、多层次的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体系。

同时，人居环境生态适宜性分析支撑了县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规划结合生态干扰分析构建生态功能分析矩阵，实现了以生态协调区、生态保育区、生态修复区、生态缓冲区 I、生态缓冲区 II 为标准的县域生态功能区划，提炼出“一极、两带、两片、五廊、八点”的生态安全格局结构。

最终，以最优网络模式为目标，对以上结构中的关键性生态空间进行全面的生态网络识别、修复、补充与完善，形成了包含人居活动集中区、三级生态廊道、二级生态缓冲区和三级生态功能空间的完整生态安全格局，成为后续各系统规划分析的基础和前提。（图 2）

2.4. 基于产业生态链和开发开放格局的产业发展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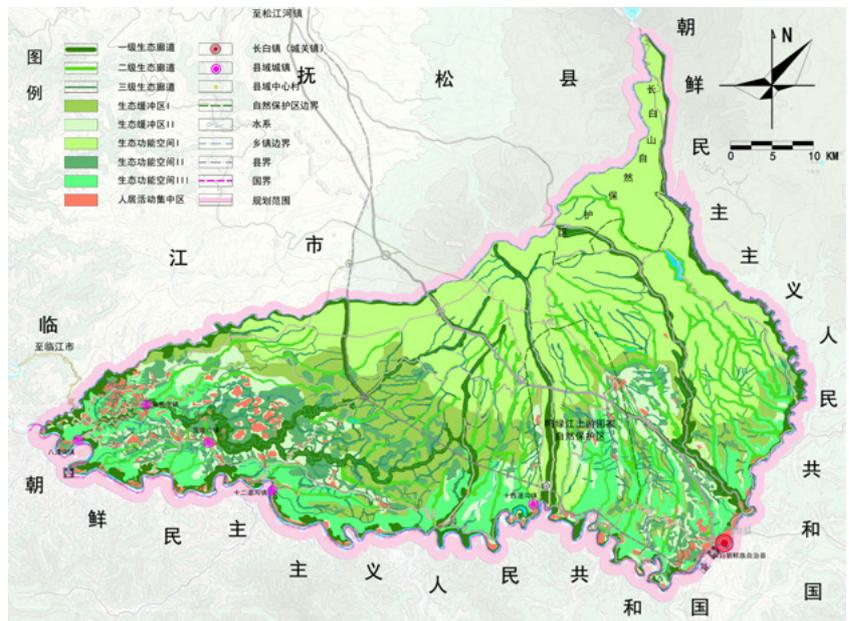


图 2，长白县域生态安全格局规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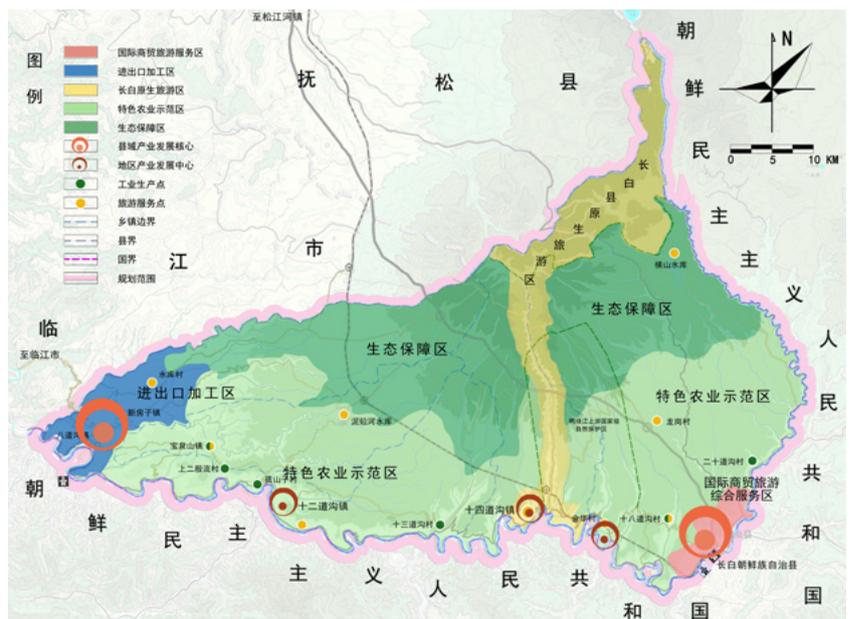


图 3，长白县产业空间布局规划图

长白县的产业发展则抓住生态敏感地区和边境城市的区位特征，明确生态和边贸两大核心关键词，通过产业生态链的重构，分别向上游和下游进行产业链的延伸，凝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产业生态网络。规划依据对朝鲜开发开放的阶段性情景分析，提出了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即在近期以产业升级为主导，逐步弱化与生态功能区要求相悖的传统优势产业，并通过技术改造和创

新，推动相关产业的生态化转型；而核心支柱型产业则在近期范围内进行产业整合和空间集聚，并在远期通过二三产融合，形成四大产业集群，形成 4+2+X 的产业体系战略构架。

同时，规划应用产业生态学原理，以发展循环经济、构筑生态产业集群为根本，与人居环境生态适宜性分析相协调，形成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互相协调的产业空间格局。最终以长白县生态网络格局的

规划为基底,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形成“两核、三心、五区、多点”的产业空间结构。(图3)

2.5、引入恢复生态学理论,优化长白县城乡人居体系

长白县城乡人居体系规划的创新在于在传统规划体系中融入了恢复生态学的分析逻辑,将城乡人居体系规划与生态恢复与重建融合的关键分解为生态服务功能的恢复、生态网络格局的重建和生态工程技术的应用三个方面。

规划针对长白县 123 个村庄建立了综合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将评价基准从传统的人口、经济、设施等扩展为生态适宜性水平、自然资源水平、人口与经济水平、交通与区位条件、空间与建设水平以及未来可预见的外部因素等五个方面,从而整合评价得到每个村庄最终评分。现状村庄由此划分为生态恢复型、控制改造型、中心服务型、产业配套型和融入城镇型 5 类,除生态恢复型村庄将逐步实施生态移民外,剩余村庄形成“集镇-中心村-基层村”3 个层次的村庄人居体系等级结构。

规划对中心村的选择在村庄发展潜力的基础上,考虑了生态网络的重建,不仅提出对生态廊道和生态功能空间的避让,并优先布局在人居环境生态适宜性较好区域的中心地区,以便接纳区域的生态服务功能。

最后,规划依据村庄的生态特征将其划分为沿江型、岗上型和沟谷型村庄三个类型。在此基础上,与村庄人居体系划定的五类发展方向类型共同构成了村庄发展导引的分类矩阵,形成了共含有 15 个子类的村庄发展策略类型框架。(图4)

2.6、构建最优生态网络,实践绿色基础设施规划

宏观性生态规划的实现有赖于绿色基础设施的技术支撑,尤其是在生态适宜性一级区域,通过绿色基础设施的布局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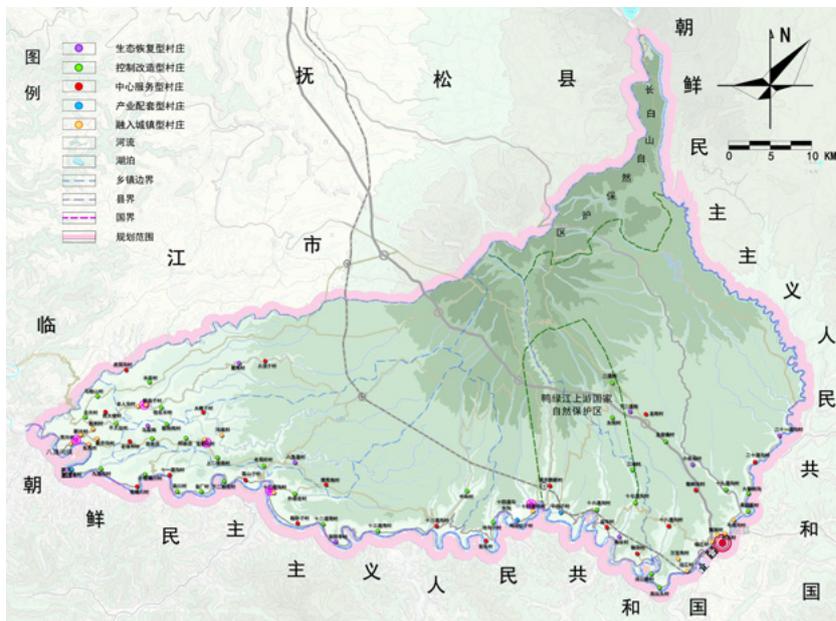


图4,长白县城乡人居体系发展策略规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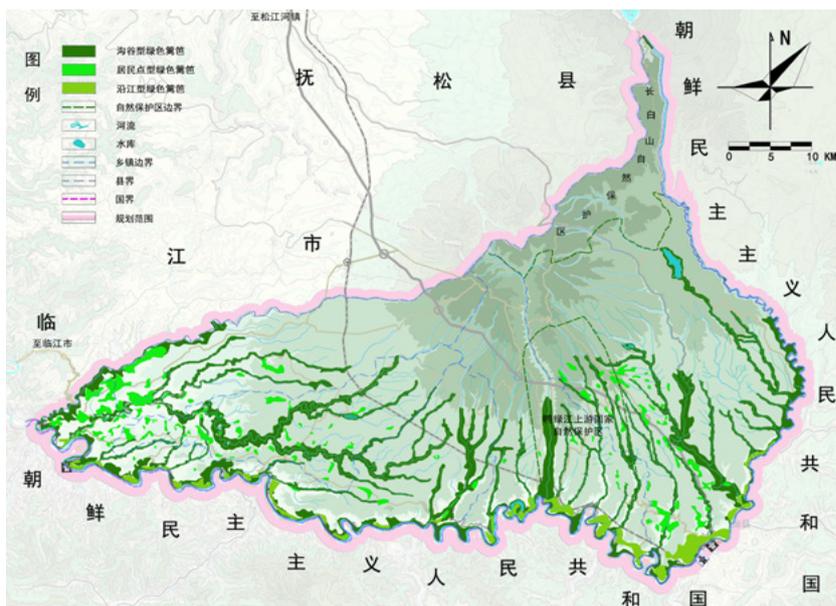


图5,长白县绿色篱笆系统布局规划图

成微观尺度上的最优生态网络,避免人居环境的密集对周边生态产生破坏性影响。

长白县的绿色基础设施包含绿色篱笆与绿色海绵两套相辅相成的系统,并在生态廊道基础上加以细化。规划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现状配置不同类型的绿色篱笆和绿色海绵类型,分别分为沟谷型、沿江型和岗上型绿色篱笆以及居民点型、沟谷型绿色海绵。以沟谷型绿色篱笆为例,其

主要位于河流两侧坡地,阻隔坡向水土流失,防治农业生产污染;沟谷型绿色海绵与沟谷型绿色篱笆结合,实现雨洪调蓄、补给篱笆用水、连接绿色篱笆、创造小型生境以及控制河流污染的作用。两者集集成网,与沟谷边缘的生态廊道有机结合,构建山体、水系与居民点之间的生态缓冲空间,保障生态廊道的功能完善,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的生态安全。(图5)

2.7、依托生态风险评价 (ERA)，优化空间管制规划

规划在基于生态风险评价结果的基础上，形成以土地利用总体布局为核心的空间规划对策。其中，生态安全格局规划与空间管制规划关系密切，实现管制要求的控制体系可以用特定的生态风险准入规定实现。针对不同生态风险等级的片区实行差异化的空间管制策略，区分管制中的刚性与弹性，从而实现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和空间总体布局的引导。

在长白县人居环境生态适宜性和用地适建性评价的基础上，通过对现状生态干扰度分析与生态适宜性评价结果分别分级赋值进行矩阵叠加分析，得出生态风险评价结果，包括低、较低、中等、较高、高风险区域共 5 级，是县域空间管制的重要依据。最终规划形成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优化发展区和重点发展区共 4 种生态空间管制分区类型，并制定相应的土地利用优化策略和空间管制要求。(图 6)

3、规划实施

2013 年 6 月，《长白县城乡发展规划》在长春市通过了由吉林省政策研究室主持的专家评审，来自北大、中国中医药大学以及吉林省各主要职能部门的专家和领导给予了一致好评，并逐渐在以下两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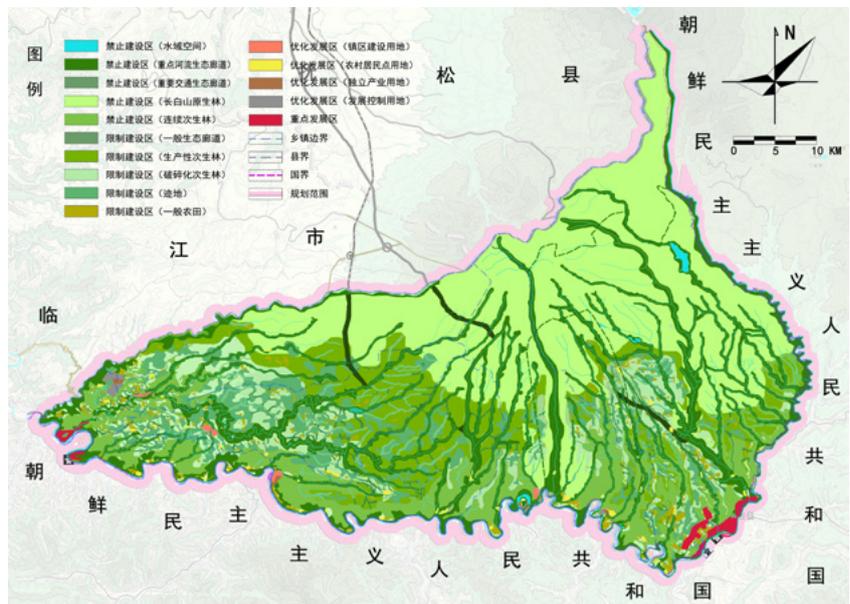


图 6，长白县空间管制规划图

面体现出积极的社会影响：

首先，本次规划影响了多个同层面规划，有力推进了长白县的各项实际工作。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协助编写《长白国家级边境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实施方案》，推动长白县最终于 2013 年 12 月得到国务院审批，正式成为中国第四个国家级边境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2014 年，长白县又被列入了全国进行市县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试点名单，随后编制的《长白县主体功能区规划》同样以本次规划为基础，实现了长白县在开发开放试验区规划、主体功

能区规划和城乡发展规划这三大规划上的协调一致。目前，本团队正在编制《长白县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并配合发改委“十三五规划”的编制，从而实现在长白县的“多规协调”。

其次，本次规划引领了长白县城乡规划体系的建立。规划完成后，《长白县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各镇控规和重点村庄规划陆续编制，正在将规划思路贯彻在法定规划体系中。长白县的城乡规划体系以此为开端，正在逐步地建立和完善。

(上接第 27 页)

4.5、中心城区规划城市空间总体格局

城市空间功能具体阐述为“四横三纵、六核八组团”的结构(27 页图 4)。

四横：自北向南分别是：依托淮上大道向西指向怀远县城，向东指向沫河口工业新镇；依托淮河联系淮南、马城镇、怀远县城、中心城区、沫河口镇及凤阳县城；依托东海大道联系涂山风景名胜区、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中心、蚌埠南站至凤阳县城；依托南外环路延伸线向东指向凤阳县城，向西指向马城工业新

镇。

三纵：西部发展轴线依托大庆路连接淮河北部的蚌埠工业园区和南部的高新区；中部发展轴线依托延安路和解放路连接蚌埠经济开发区、老城区与淮上区，且向北指向曹老集镇与新马桥镇；东部发展轴线依托锥子山路和老山路连接长淮卫分区以及李楼分区，且向北指向沫河口镇。

六核即指“两主四副”的城市级公共中心。

进一步依据城市建设基础与未来职

能导向，由淮河、京沪铁路、东海大道、市政走廊、席家沟生态绿廊与龙子湖生态绿廊等空间要素界定，将中心城区划分为八个城市功能组团：老城分区、城南分区、姜桥分区、禹会分区、淮上分区、蚌埠工业园区、长淮卫分区和李楼分区。其中，西部工业区包括蚌埠工业园区、禹会分区，中部生活区包括老城分区、城南分区、姜桥分区和淮上分区，东部综合区包括长淮卫分区和李楼分区。

求精·做实·解难·创新

同济规划简讯

TONGJI PLANNING NEWSLETTER

发行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主编

周俭

副主编

张尚武

编委

周玉斌、王新哲、肖达、李鹰、王颖、俞静、梁洁、马强、罗志刚

特约编辑

孙施文、戴慎志、李京生、唐子来

设计 | 校对

贺飞、顾鲁燕、陆佳元、叶萍

免费订阅

可通过邮箱订阅 news@tjupdi.com

可通过电话订阅 65987298 宣传办

来信明细：姓名、公司名称、投递地址、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上海市中山北二路1111号 同济规划大厦

邮箱：net@tjupdi.com | 网址：<http://tjupdi.com>

创刊

2010年9月

封面图片来源

蚌埠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年）